

國史館出國報告

(出國類別：☒考察參訪 ☐資料蒐集 ☐機關交流合作
☐國際會議 ☐業務接洽
☐其他公務活動_____)

2026 年考察美國國家文書暨檔案總署及蒐
集檔案史料計畫報告

服務單位：國史館館長室、
修纂處

姓名職稱：陳館長儀深
廖處長文碩
陳薦任協修昶安

派赴國家：美國

出國期間：2026 年 3 月 27 日至
2026 年 4 月 6 日

報告日期：2026 年 6 月 26 日

報告摘要

本館依《總統副總統文物管理條例》典藏與管理歷任總統、副總統檔案，並配合政府資訊公開政策推動史料整理、開放與加值應用，目前正積極推動國史研究與總統圖書館規劃。然而國內外仍散存大量相關史料，需持續進行調查、蒐集、整理與數位化，以利多元歷史敘事與學術研究。尤其近年中華人民共和國刻意扭曲二戰及終戰文件，以支撐其對臺灣的法律戰與輿論戰，回顧臺灣法律地位在二戰後至冷戰時期的複雜歷史，攸關臺灣生存，其間美國曾視臺灣為「無主之島」、1949 年前後對國民黨政權的批判，韓戰期間美國對臺政策所持戰略性目的；1970 年代後，美中關係正常化、美臺斷交，美國依三個公報、《臺灣關係法》與六項保證處理臺灣事務，對臺灣地位維持刻意模糊。2025 年美國在臺協會明確指出二戰文件並未決定臺灣最終政治地位，此為首次具體表述，並符合美國一貫政策。為深化對臺灣法律地位與戰後臺美關係之研究，本次考察參訪美國國家文書暨檔案總署（National Archives and Records Administration, NARA）轄下國家檔案博物館（National Archives Museum）、國家檔案館二館（The National Archives at College Park, Archives II），以及普林斯頓大學圖書館（Princeton University Libraries）、國家憲法中心（The National Constitution Center）等機關（構），蒐集相關史料，瞭解總統檔案管理與開放經驗，以為本館執行相關業務之參考，蒐集史料成果並將出版或納入總統資料庫供學界與社會使用。透過史料調查蒐集，理解大國開放檔案的制度精神，並從更宏觀國際脈絡，檢視二戰後臺美關係與美國對臺政策的長期思維。就本次考察所得，提供建議如下：一、刊布檔案史料，強化中華民國臺灣主體意識；二、推動與國外檔案典藏機關、總統圖書館、學術研究機關共同研究與出版；三、調查蒐集總統副總統文物，充實總統資料庫及轉型後之歷任總統圖書館館藏。本次考察承蒙外交部北美司、駐美代表處、駐舊金山辦事處、駐紐約辦事處以及美國學界、僑界等協助聯繫，特致謝忱。

目錄

報告摘要.....	i
壹、前言.....	1
一、考察緣起.....	1
二、考察目的.....	2
貳、參訪經過.....	4
一、行前準備及聯繫概況.....	4
二、考察行程概述.....	5
三、考察行程表.....	7
參、參訪紀要.....	9
一、國立非裔美國人歷史與文化博物館（National Museum of African American History and Culture）.....	9
（一）機構介紹.....	9
（二）主要館藏與展覽.....	9
二、美國大屠殺紀念館（United States Holocaust Memorial Museum）.....	11
（一）機構介紹.....	11
（二）主要館藏與展覽.....	12
三、拜訪臺美關係研究專家王景弘先生.....	13
四、國家檔案館二館（The National Archives at College Park，Archives II）.....	14
（一）參訪紀要.....	14
（二）座談紀實.....	15
（三）美國國家文書暨檔案總署藏臺灣法律地位、戰後臺美關係等相關檔案史料調查蒐集.....	19
五、「從一省到一國：從 1951、1971、1991 三個關鍵年代；From a Province to a Sovereign State: Political Changes in Taiwan from the Three Critical Years 1951, 1971 and 1991」座談會.....	47
（一）演講紀實.....	47
六、華府參訪國家檔案館博物館、雙橡園及臺灣人公共事務會（FAPA）華府總部.....	49
（一）機構介紹.....	49
（二）參訪紀實.....	50
七、普林斯頓大學特藏部暨穆德圖書館（Princeton University Library：Special Collections、Seeley G. Mudd Manuscript Library）與葛斯德東亞圖書館（Princeton University Library：East Asian Library）.....	54
（一）機關介紹.....	55
（二）參觀紀要.....	56
（三）參訪與座談紀實.....	57

(四) 普林斯頓大學圖書館藏杜勒斯文書 (John Foster Dulles Papers) 有關臺灣法律地位、戰後臺美關係等檔案史料調查蒐集	58
八、「紀念二二八—談蔣介石的責任問題及其他」座談會	68
(一) 演講紀實	68
九、國家憲法中心與獨立廳	70
(一) 機構介紹	70
(二) 參訪紀要	70
肆、參訪心得	72
一、檔案史料管理部分及資料蒐集	72
二、總統檔案館及大學圖書館部分	72
伍、建議事項	74
陸、參考資料	76
一、國立非裔美國人歷史與文化博物館相關資料	76
二、美國大屠殺紀念館相關資料	77
三、國家檔案館相關資料	80

壹、前言

一、考察緣起

本館為「總統副總統文物管理條例」主管機關，依法典藏、管理及開放應用歷任總統、副總統檔案文物，並依據政府「資訊公開」政策原則，妥善保存、整理編纂歷任總統、副總統檔案文物。本館歷任總統副總統檔案文物館藏內容豐富多元，因應開放政府與深化臺美夥伴關係之施政目標，為整合本館資料與聯結國內外資源，加速開放，刻正大力推動國史相關研究出版與歷任總統圖書館之擘劃：近年出版《美國國家安全與對臺政策檔案選譯》（2023-2025）、《從中美共同防禦條約到臺灣關係法史料彙編》（2023）等；2020年6月開始執行「歷任總統資料庫」建置計畫，2022年「歷任總統資料庫入口網」及「蔣經國總統資料庫」先行上線開放，2023年「李登輝總統資料庫」接續開放，「蔣中正總統資料庫」預計於2026年底上線。然而相關史料文物仍大量散落國內外，當全面展開調查蒐集工作，進行資料整理、數位化與出版，探索數位媒材加值運用、數位人文探勘與多元歷史表述形式，俾供各界據以檢視。

近年來，中華人民共和國一再刻意扭曲二戰時期及終戰文件，試圖以法律戰、輿論戰支持其武力脅迫臺灣的行動。回顧臺灣法律地位的歷史背景，1944年，美國海軍曾計畫自臺灣發動登陸作戰，但因當時美軍西南太平洋區總司令麥克阿瑟（Douglas MacArthur）堅決主張先奪回菲律賓，美方最終改以沖繩為下一個攻擊目標，使臺灣得以躲過可能十分慘烈的戰火。戰後臺灣的國際地位變得格外複雜，美國甚至一度將臺灣視為「無主之島」，認為沒有真正的主權擁有者。1949年杜魯門（Harry S. Truman）政府發表的白皮書中，對國民黨政權的腐敗與無能提出嚴厲批評，等同劃清界線，顯示美國的政策傾向「保臺不保蔣」。韓戰爆發後，美國第七艦隊進入臺灣海峽，表面上是協防中華民國，實際上則是基於自身安全考量，以確保韓戰後方的穩定。蔣中正得知美方有意推動「臺海中立化」時，便在日記裡明確表示，他絕不會公開承認此舉，以避免陷入喪失主權的局面。這種「以拖待變」的策略，使得臺灣的法律與政治地位未完全確定。

1970年代以降，美中關係逐漸走向正常化，美臺斷交後，美國政府主要依據3個美中公報、《臺灣關係法》及6項對臺保證，處理臺灣事務。美國內部對臺灣存在多元看法，並未形成共識，美國外交政策也因不同利益與角度，呈現不同標準，對臺灣地位的立場模糊。然而中華人民共和國近年來一再刻意扭曲二戰時期及終戰文件，包括《開羅宣言》、《波茨坦公告》和《舊金山和約》，試圖支持其脅迫臺灣的行動。2025年9月，美國在臺協會（AIT）對此明白強調，二戰文件

並未決定臺灣最終政治地位。如 AIT 前理事主席卜睿哲 (Richard Bush) 受訪所言，這是 AIT 首次如此具體措辭，但符合美國長期政策。

臺美關係攸關中華民國生存發展，鑑往知來，史料的編譯刊布十分重要為調查蒐集臺灣法律地位、戰後臺美關係等相關檔案史料，並考察總統檔案史料文物管理及應用經驗，爰規劃參訪美國國家文書暨檔案總署 (National Archives and Records Administration, NARA) 轄下國家檔案博物館 (National Archives Museum)、國家檔案館二館 (The National Archives at College Park, Archives II)，以及普林斯頓大學圖書館 (Princeton University Libraries)、國家憲法中心 (The National Constitution Center) 等機關 (構)，以為本館執行相關業務之參考。

本次調查蒐集臺灣法律地位、戰後臺美關係等相關檔案史料，預定標的包括：(一) 美國國家檔案館二館藏檔案群 59 (RG59) 為主之 1943 年至 1990 年代初期臺灣法律地位相關尚未數位化上網資料，包括 Secret and Top Secret Files Relating to Military Government and Civil Affairs (1943–1947)、Top Secret Subject Files (1945–1950) 等系列；(二) 美國國家檔案館二館藏檔案群 84 (RG59) 美國國務院外交使團檔案中 1950 年代臺灣相關尚未數位化上網資料，包括 Top Secret General Records (1949–1958)、Taiwan 1956–1958 等系列；(三) 調查蒐集普林斯頓大學穆德圖書館藏杜勒斯文書 (John Foster Dulles Papers) 有關對日和約談判、臺海危機、臺美關係資料已數位化但未上網資料，包括 Selected Correspondence, 1891–1960 系列各件。

本次調查蒐集檔案史料成果，將選譯編輯出版或摘錄匯入本館總統資料庫，以提供學術界及社會各界參研。透過閱讀檔案史料，可以看見大國以檔案為公共資源，依循法律開放政府資料所展現的恢宏氣度。同時，在強權競逐的格局下，探討二戰後臺美關係的歷史發展，必須放入美國與蘇聯、日本、中共及其他相關國家互動的整體脈絡加以審視。唯有全面觀察各方的行為模式，理解臺灣在其中所處的位置與被討論的方式，才能進一步對照檢視美國對臺政策的思維、臺美關係的發展軌跡，並深化對其歷史意義的認識。

二、考察目的

(一) 調查蒐集美國國家檔案館二館藏 1943 年至 1990 年代初期臺灣法律地位相關尚未數位化上網資料，洽商進行檔案資料交換、複製及史料編輯出版。

(二) 調查蒐集美國國家檔案館二館藏美國國務院核心檔案與外交使團檔案中臺灣相關尚未數位化上網資料，洽商進行檔案資料交換、複製及史料編輯出版。

（三）調查蒐集普林斯頓大學穆德圖書館藏杜勒斯文書有關對日和約談判、臺海危機、臺美關係資料已數位化但未上網資料，洽商進行檔案資料交換、複製及史料編輯出版。

（四）與普林斯頓大學東亞圖書館商談建立學術交流與合作，透過數位資料庫與服務平臺，拓展館際合作與交流。

（五）考察美國總統圖書館制度，包括美國國家文書暨檔案總署與總統圖書館之間的權責關係，總統檔案、總統重要幕僚個人文書等的徵集、審選及其開放應用的限制與管理。

（六）考察美國國家檔案博物館、國家憲法中心檔案史料應用，包括檔案史料文物展示策略、線上與實體展覽規劃、多媒體設計、社交媒體運用等。

貳、參訪經過

一、行前準備及聯繫概況

為加強本館國際學術交流等因，俾作為本館蒐集、編纂史料及建置「歷任總統資料庫」業務之參考，預計考察美國東部地區重要的學術機構、檔案館與博物館等。本考察由陳館長儀深親自領隊，率修纂處廖處長文碩、陳薦任協修昶安共 3 人參訪美國各機關、機構，俾利精進本館業務發展。

赴美國考察計畫業於本年 2 月 5 日奉核定，旋即發函外交部，請外交部北美司、駐美代表處、駐舊金山辦事處、駐紐約辦事處等派員協助安排參訪相關事宜，並檢附考察人員簡歷、考察目的與重點、考察行程表。承蒙外交部林部長佳龍關照，外交部北美司及承辦人陳慷妮科員等密切聯繫。外交部於 3 月 2 日檢送聯繫電報副本，已將本館考察計畫行程及人員名單，轉請外交部駐美代表處、駐舊金山辦事處、駐紐約辦事處協處。嗣後，承蒙駐美俞大使大潘、楊公使懿珊關照，廖處長文碩就本次考察計畫，與駐美代表處文化組哈秘書莎玲、駐紐約辦事處政治組黃組長韋仁及吳副領事珮綺、駐舊金山辦事處朱副處長永昌及教育組侯副組長國南等針對本考察計畫之細節進行討論與聯繫，協助洽排轄內美國機關（構）之拜會、參訪及通關事宜。本次考察行程緊湊紮實，共計參訪 10 個機關（構）、接洽 20 餘位人員。考察期間承蒙臺灣人公共事務會（Formosan Association for Public Affairs, FAPA）林素梅總會長、高龍榮前總會長、簡明子前總會長、林金女理事、蕭喬勻執行長等聯繫安排，僑界友人王景弘先生、潘掬慧女士、吳武雄博士、Chris Anderson 及學界喬治華盛頓大學亞洲研究中心學程主任裴斗虎（Gregg A. Brazinsky, Director of the Asian Studies Program, George Washington University）教授等熱心協助，姜裕風、牛傑柔女士等協助口譯。

本考察計畫之機票住宿，皆依「國外出差旅費報支要點」之規定核銷報支在案。搭乘本國籍航空公司（長榮航空）班機，去程為 3 月 27 日（五）長榮航空 11 時 30 分，桃園至舊金山班機，並由舊金山轉機至華盛頓雷根機場。回程為 4 月 4 日（二）美東時間晚間 18 時 21 分由費城至舊金山班機，4 月 5 日（三），美西時間凌晨 12 時 25 分乘長榮航空班機自舊金山起飛，4 月 6 日上午 5 時 30 分抵達桃園機場。行政準備方面，承辦同仁於赴美考察之前，線上調閱檔案、申請入美旅行授權電子系統（Electronic System for Travel Authorization）、訂購網路卡、出國考察保險、預約登記入境美國資料、請領本館推廣品、採購證書夾印製感謝狀。

二、考察行程概述

115 年 3 月 27 日上午 10 時 30 分，國史館考察團由陳儀深館長領隊，率修纂處廖文碩處長、陳昶安薦任協修共 3 人於桃園機場出發。經過約 12 小時的航行，於舊金山時間 3 月 27 日上午近 7 時抵達舊金山國際機場（San Francisco International Airport）。由駐舊金山辦事處朱永昌副處長、侯國南副組長接機，在辦事處協助下，考察團旋即於 9 時辦理轉機，搭乘美國國內線阿拉斯加航空前往華盛頓。是日華盛頓時間 17 點 41 分抵達隆納·雷根華盛頓國家機場（Ronald Reagan Washington National Airport），駐美代表處文化組哈莎玲秘書接機，隨即前往下榻處休息。

3 月 28 日，考察團前往華盛頓市區的國家廣場（National Mall），參觀華盛頓紀念碑（Washington Monument）、馬丁·路德·金恩紀念碑（Martin Luther King, Jr. Memorial）韓戰退伍軍人紀念碑（Korean War Veterans Memorial）、等關於美國立國精神、戰爭與民權運動的紀念場址。下午，前往馬里蘭州羅克維爾（Rockville）拜訪臺美關係研究專家王景弘先生，王先生敘述在臺灣擔任記者的經歷，之後前往美國進修與發展的狀況，並講述在檔案館找尋資料、對臺美關係研究的心得。

3 月 29 日，上午前往史密松寧學會國立非裔美國人歷史與文化博物館（National Museum of African American History and Culture, Smithsonian Institution）參觀，由駐美代表處文化組哈莎玲秘書陪同。該館於 2016 年正式開幕，致力於展示非裔美國人在美國歷史中發展的進程和對近代流行文化的影響。下午前往參訪美國大屠殺紀念博物館（United States Holocaust Memorial Museum），該館於 1993 年成立，展示大量有關納粹屠殺猶太人的檔案文件、影片與資料，旨在提醒世人種族滅絕的殘酷，以及民主、自由與人權的重要性。

3 月 30 日，前往位於馬里蘭州大學公園市（College Park）的國家檔案館二館（The National Archives at College Park, Archives II）。在駐美代表處文化組哈莎玲秘書及口譯姜浴風女士的陪同下，於上午參觀該館檔案數位化部門，並由館員介紹該館檔案資料整編與數位化情形，以及提供閱覽的管理運作模式。結束參觀後與該館檔案部門主管 John Hamilton、Timothy Enas、Stanley Fanars、Kate A. Slauch 等人進行座談交流，下午於該館進行檔案蒐集。

晚間，隨同臺灣人公共事務會（FAPA）前總會長簡明子博士前往華府臺灣基督長老教會（Taiwanese Presbyterian Church of Washington），由陳儀深館長以〈從一省到一國：從 1951、1971、1991 三個關鍵年代；From a Province to a Sovereign State: Political Changes in Taiwan from the Three Critical Years 1951, 1971 and 1991〉為題，向華府臺僑鄉親發表演說，演講由臺灣人公共事務會（FAPA）

理事林金女女士主持，現場僑胞回應熱絡，與館長多有互動。31 日前往國家檔案館二館（The National Archives at College Park，Archives II）蒐集檔案資料，晚間返回下榻處休息。

4 月 1 日，上午考察團成員與駐美大使俞大藩夫婦、駐美代表處文化組哈莎玲秘書一同前往位於華盛頓特區的國家檔案博物館（National Archives Museum）參訪，由館員進行導覽解說《獨立宣言》、《美國憲法》、《權利法案》等與美國立國精神與歷史發展息息相關的重要文件，並參觀檔案庫房，得見兩國過去簽署的重要條約協定，包括《中美共同防禦條約》（Sino-American Mutual Defense Treaty）、《臺灣關係法》（Taiwan Relations Act）等之原件。中午前往雙橡園（Twin Oak Estate）參訪，午間駐美大使俞大藩夫婦於雙橡園第凡內廳（Tiffany Room）宴請考察團，駐美公使楊懿珊坐陪。下午前往 FAPA 於華盛頓的總部，拜訪林素梅總會長、高龍榮前總會長、蕭喬勻執行長等，瞭解近年該會於國會推動之友臺法案脈絡、跨黨派運作策略或僑界倡議經驗等。晚間考察團成員乘車抵達紐澤西州普林斯頓市，前往下榻處住宿休息。

4 月 2 日，考察團前往普林斯頓大學穆德圖書館（Princeton University Seeley G. Mudd Manuscript Library）調閱《杜勒斯文書》，進行檔案調查與蒐集。

4 月 3 日，上午考察團由駐紐約代表處政治組組長黃韋仁及隨行口譯牛傑柔女士陪同前往普林斯頓大學圖書館參訪。由普林斯頓大學圖書館特藏部主管 Daniel J. Link 介紹普林斯頓大學圖書館特藏部的運作方式與館藏，並由普林斯頓大學葛思德東亞圖書館（Princeton University East Asian Library）館長何義壯（Martin Heijdra）與東亞圖書館中文部主任邵玉書（Joshua Seufert）簡介特藏部收藏與胡適相關的書籍與文件。

下午前往東亞圖書館，由館長何義壯、東亞圖書館中文部主任邵玉書帶領參觀東亞圖書館的館藏，並介紹圖書館購置館藏與營運的模式。參訪結束後，雙方進行座談，館方除介紹胡適於擔任東亞圖書館館長時的情況，雙方亦談及史學巨擘余英時先生在普林斯頓大學的教學研究生活。晚間在 FAPA 林素梅總會長、高龍榮前總會長的陪同下，前往羅格斯大學（Rutgers University）Bucsh 學生中心，由 FAPA 紐澤西州分會負責人何明宗先生主持，陳儀深館長以〈紀念二二八—談蔣介石的責任問題及其他〉為題向紐澤西州的臺僑鄉親發表演說，演說結束後陳儀深館長與聽眾互動熱絡。

4 月 4 日，上午考察團在 FAPA 高龍榮前總會長、林素梅總會長的陪同下，前往費城的國家憲法中心（National Constitution Center）參訪，下午前往費城獨立廳（Independence Hall）參訪，聽取導覽，瞭解美國獨立運動與憲法制定的歷

程。結束後，前往費城國際機場（Philadelphia International Airport）搭乘聯合航空班機飛往舊金山機場，由駐紐約辦事處副領事吳珮綺協助通關。美西時間午間 9 時 40 抵達舊金山機場，由駐舊金山辦事處侯國南副組長接機，並協助轉機。考察團等待搭乘 4 月 5 日凌晨 12 時 25 分之長榮班機飛往桃園機場，經歷約 12 小時之航程，考察團於 4 月 6 日 5 時 30 分順利返抵國門，圓滿完成考察任務。

三、考察行程表

日期	地點	參訪機構	備註
3/27 星期五 (華盛頓 1)	臺北 →舊金山 →華盛頓	赴美航程：搭乘長榮航空 BR008 飛舊金山；阿拉斯加航空 AS8 飛華盛頓。	10:30 起飛，預計 06:40 抵美舊金山機場。09:20 起飛，美東時間 17:41 抵達華盛頓雷根國際機場宿華盛頓。
3/28 星期六 (華盛頓 2)	華盛頓	華盛頓紀念碑 (Washington Monument)、韓戰退伍軍人紀念碑 (Korean War Veterans Memorial)、馬丁·路德·金恩紀念碑 (Martin Luther King, Jr. Memorial)。 拜訪臺美關係研究專家王景弘先生	宿華盛頓。
3/29 星期日 (華盛頓 3)	華盛頓	史密松寧學會國立非裔美國人歷史與文化博物館 (National Museum of African American History and Culture, Smithsonian Institution)、美國大屠殺紀念博物館 (United States Holocaust Memorial Museum)。	宿華盛頓。
3/30 星期一 (華盛頓 4)	華盛頓 →馬里蘭州大學公園市	國家檔案館二館 (The National Archives at College Park, Archives II)、陳儀深館長於華府臺灣基督長老教會 (Taiwanese Presbyterian Church of Washington) 發表演說。	宿華盛頓。
3/31 星期四 (華盛頓 5)	華盛頓 →馬里蘭州大學公園市	國家檔案館二館 (The National Archives at College Park, Archives II)。	宿華盛頓。

日期	地點	參訪機構	備註
4/1 星期五 (普林斯頓 1)	華盛頓 → 普林斯頓	國家檔案博物館 (National Archives Museum)、雙橡園 (Twin Oaks Estate)、FAPA 總部。	赴普林斯頓車程約 3 小時，宿普林斯頓。
4/2 星期六 (普林斯頓 2)	普林斯頓	普林斯頓大學穆德圖書館 (Princeton University Library: Seeley G. Mudd Manuscript Library)。	宿普林斯頓。
4/3 星期日 (普林斯頓 3)	普林斯頓	普林斯頓大學圖書館特藏部 (Princeton University Library: Special Collections)、普林斯頓大學葛思德東亞圖書館 (Princeton University Library: East Asian Library)	宿普林斯頓。
4/4 星期一 (舊金山)	普林斯頓 → 費城 → 舊金山	國家憲法中心與獨立廳 (The National Constitution Center & Independence Hall) 聯合航空 UA1575 前往舊金山	前往費城國際機場， 美東時間 18:21 起 飛，美西時間 21:39 抵達舊金山國際機 場。
4/5 星期二 (舊金山)	舊金山 → 桃園機場	返臺航程：長榮航空 BR027	00:25 於舊金山國際 機場起飛，在機上 過夜
4/6 星期三	桃園機場	返臺航程：長榮航空 BR027	05:30 抵達。

參、參訪紀要

一、國立非裔美國人歷史與文化博物館 (National Museum of African American History and Culture)

(一) 機構介紹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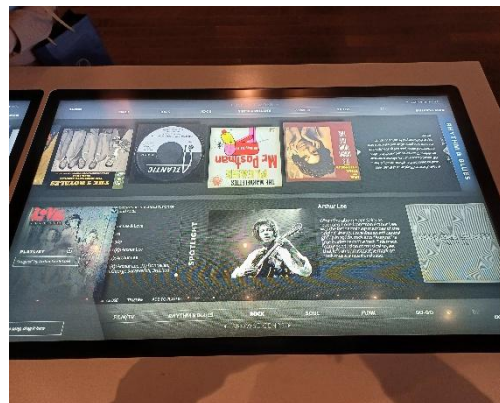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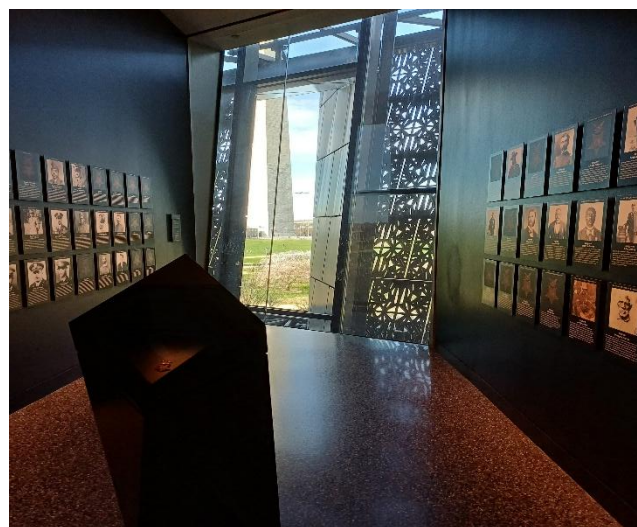
3月29日上午由駐美代表處文化組哈莎玲秘書陪同，前往國立非裔美國人歷史與文化博物館 (National Museum of African American History and Culture) 參觀，該館 2016 年成立於華盛頓特區，為世上最大，最為綜合性的博物館展場之一。透過展覽、研究以及各式計畫，呈現豐富的非裔美國人歷史與生活文化。

(二) 主要館藏與展覽

博物館樓高地面五層，地下挑高三層，包括蒐集與捐贈收藏超過四萬件物品。最高層為文化展廳 (Culture Galleries)，展覽的是非裔美國的流行文化與藝術，包括影視、舞蹈、劇場與音樂創作。

其次為社群展廳 (Community Galleries)，涵蓋非裔美國人的軍事貢獻、體育成就，以及供家庭親子互動的展示空間。





網球名將大小威廉斯（Venus Williams、Serena Williams）銅像；紀念為國貢獻者的尖塔，正對華盛頓紀念碑，兩側展示為國服役的非裔美國人照片。



另有《黑暗中的靈魂》（Spirit in the Dark）的展覽探討宗教在黑人美國故事中的核心地位，橫跨神聖與世俗、抗議與讚頌、苦難與希望三大主題。

地面層則為入口大廳以及沉思庭院（Contemplative Court）。這個寧靜的空間是為了讓參觀者在離開地下歷史展廳後，有空間靜下心來沉澱與反思。



地下共三層為歷史展廳：奴隸制度與自由（Slavery and Freedom）、捍衛自由、定義自由——種族隔離時代（Defending Freedom, Defining Freedom: Era of Segregation）以及變動中的美國——1968 年及其後（A Changing America: 1968 and Beyond）。依序從奴役貿易開始，到美國建國、美國內戰及重建時期，及進入二十世紀後到民權運動（Civil rights movements）之後。講述非裔美國人如何遠渡重洋抵達新大陸，如何從奴役走向自由，並爭取個人權利至今。



美國《獨立宣言》的主要起草人，湯瑪斯傑佛遜（Thomas Jefferson），同時也是黑人奴隸的莊園主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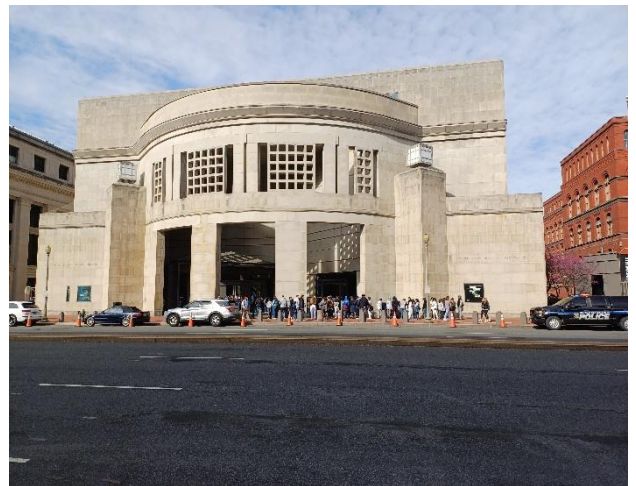


種族隔離時期（Era of segregation）的火車車廂博物館由地下室往上策展的設計，彰顯非裔美國人在歷史上的進程，以及對近現代美國文化與生活顯著的影響。

二、美國大屠殺紀念館（United States Holocaust Memorial Museum）

（一）機構介紹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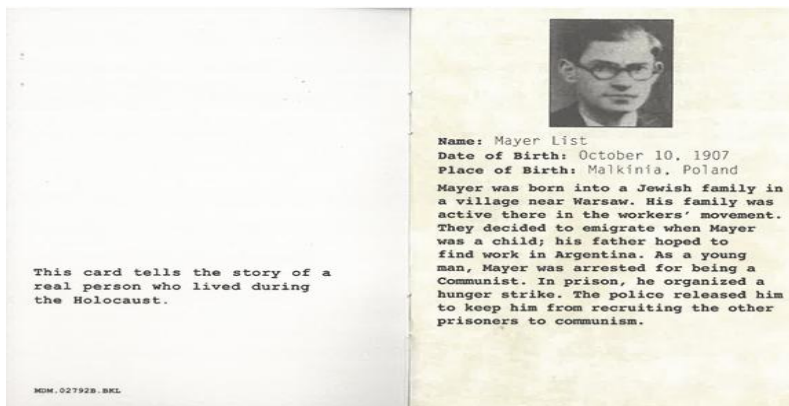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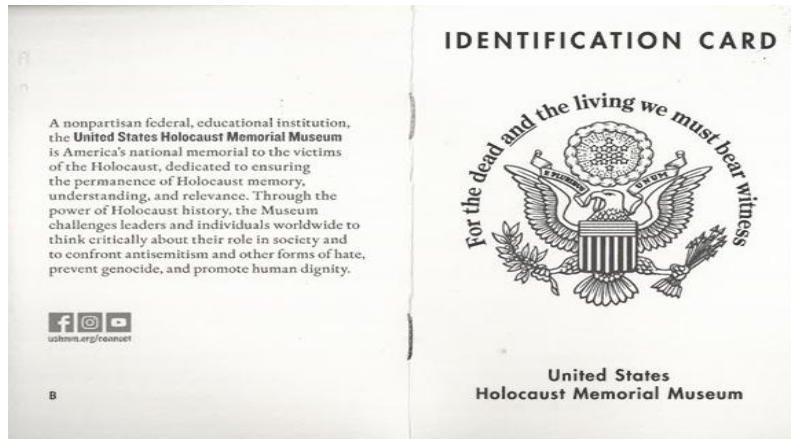
3 月 29 日下午，考察團前往美國大屠殺紀念博物館（United States Holocaust Memorial Museum）參觀，該館於 1993 年成立，該館宗旨是幫助世界各地來訪的參觀者瞭解歷史、正視仇恨、預防種族滅絕、維護人類尊嚴。該館已接待數以千萬人次的參觀者，所展示大量有關納粹屠殺猶太人的資料，值得人們省思。



（二）主要館藏與展覽

博物館收藏數以百萬計的文件、文物、照片、影片、書籍與證詞。館藏資料庫收錄超過二十餘萬筆的紀錄，涵蓋大屠殺前後時期的照片與相簿，個人故事、家庭電影、回憶錄與日記等資料。展覽主要以歷史進程講述納粹的崛起（Nazi Assault），對猶太人的迫害與屠殺及最終解決方案（Final Solution），乃至最後的

篇章（The Last Chapter），納粹戰敗後的救援與善後工作。導覽有特別的設計，人們入場時將搭乘電梯抵達展場，每人可獲得一份身分識別卡，在導覽過程可逐步瞭解卡片人物的遭遇。



在博物館官網的大屠殺百科（Holocaust Encyclopedia）也可以查詢到每位傳主的生平與處境。

<https://encyclopedia.ushmm.org/content/en/id-card/mayer-list>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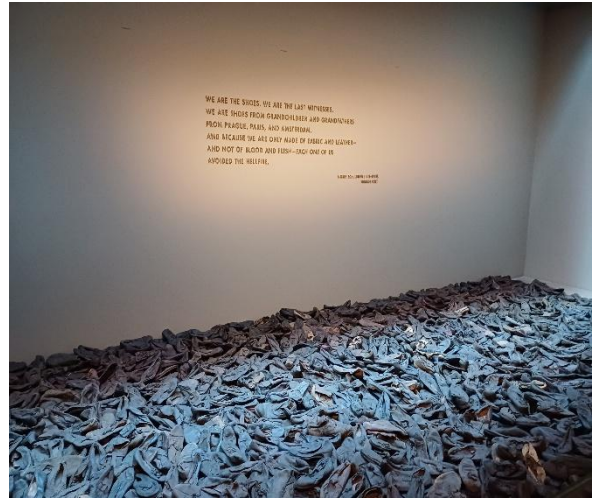
納粹德國席捲歐洲。



受難者的照片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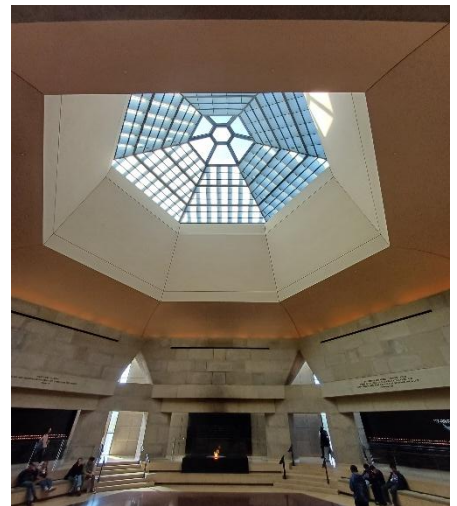
運送受難者的列車



從集中營收集而來的鞋子



倖存者的證言



省思與沉思的紀念廳

該博物館不僅是供人參觀的展覽場所，更是記憶的集合，教育與研究的場所。旨在提醒來訪人士永遠銘記曾經發生過的仇恨與災難，並防範憾事再度發生。

三、拜訪臺美關係研究專家王景弘先生

3月28日下午，參訪團專程前往馬里蘭州羅克維爾（Rockville）拜訪臺美關係研究專家王景弘先生，王先生敘述早期曾在臺灣擔任新聞記者，之後前往美國進修與發展經歷，以及對臺美關係研究及到檔案館找尋資料的心得與經驗。

王景弘先生講述曾在《新生報》與《聯合報》擔任記者數年後，於1970年代初期前往美國深造。希望能在美國尋找在當時臺灣封閉環境下無法獲得的資料與歷史真相。在進修的過程中，受到美國外交史教授的啟發，學會了從原始檔案

中尋找答案。1970 年代中期《聯合報》創辦人王惕吾先生在美國創立《世界日報》後，王景弘先生曾前往美國採訪報導新聞，之後定居於華府擔任特派員。

王景弘先生長期在 NARA 研究解密的外交文件，出版許多專論與書籍。他透過研究《舊金山和約》發現，條約文件中並未規定臺灣主權的歸屬，這與當時政府宣稱開羅會議確定了臺灣主權依據的說法有所出入。此外尚有許多外交資料，包括，臺灣如何利用美國資金執行「前鋒計畫」，派遣農耕隊援助非洲以鞏固邦交等事項。

王先生接著提到《聯合報》與《中國時報》在李登輝執政後期，因政治立場轉向導致讀者流失，而《自由時報》則乘勢崛起。王先生說明，在華府期間與美方外交專家譚慎格（John J. Tkacik）建立了長期合作關係，兩人常就臺灣主權與外交檔案進行深入討論，並持續在媒體發表專論。王先生表示儘管年歲增長，檔案研究工作艱辛，仍將致力於爬梳檔案，挖掘真相，提供給臺灣的社會大眾。

四、國家檔案館二館(The National Archives at College Park, Archives

II)

(一) 參訪紀要

2026 年 3 月 30 日由陳儀深館長率領考察團前往位於馬里蘭州大學公園市 (College Park) 的國家檔案館二館 (The National Archives at College Park, Archives II)，並於上午進行參訪。

館方介紹了多種掃描技術，從處理大量文件的輸送掃描器，到針對脆弱書籍與大尺寸地圖的專業設備。除了技術層面，檔案館也向訪客展示了研究中心的開放空間，說明研究人員如何利用館方提供的免費掃描儀，與輔助工具調閱歷史檔案，以及定時公布數位化成果統計數據。導覽中進一步介紹了檔案的優先排序，以及處理涉及國家安全或敏感資訊的機密檔案檢視流程。並說明除了聯邦政府檔案，國家檔案館也會接收地方政府的檔案，如馬里蘭州政府的檔案。

最後，透過展示此次赴美調閱新解密的實體檔案，呈現了檔案館在保存政府紀錄與推廣公眾閱覽之間的重要職責。參訪過後與該館檔案部門主管 John Hamilton、Timothy Enas、Stanley Fanars、Kate A. Slauch 等人進行座談交流。座談結束後，由陳館長致贈國史館館藏，1950 年代、麥克阿瑟 (Douglas MacArthur) 將軍以及國務卿杜勒斯訪問臺北時的照片。

（二）座談紀實

檔案部門主管 John Hamilton 首先表達歡迎之意，雙方就下列議題：包括，國家檔案館與總統圖書館系統的起源、總統圖書館的轉型、總統圖書館與私人基金會的合作、檔案管理法規與個人文件捐贈，等議題進行討論。

John Hamilton 首先說明國家檔案館的成立始於 1934 年。在此之前，係由聯邦機構、白宮、法院和國會等機構分別管理自己的檔案文件。但不幸的是，這些資料過去往往被隨意存放在閣樓或地下室的箱子裡。直到羅斯福（Franklin D. Roosevelt）政府時期成立檔案館，專責檔案管理員才成為政府職位，並開始建立設施來管理並提供這些紀錄的閱覽服務。

總統圖書館系統的建立始於羅斯福總統。他本身也是位收藏家，收集郵票、模型船，且對海事歷史非常感興趣。在其任內就有建立存放個人紀錄與收藏品之庫房之遠見，羅斯福並在紐約海德公園（Hyde Park）的自家土地上建造了設施。這成為歷任總統直到小布希（George W. Bush）為止的標準模式：由總統籌集私人資金建造設施，並將設施移交給 NARA。目前 NARA 主要管理從胡佛總統（Herbert Clark Hoover）到小布希總統的總統圖書館。

但是到了歐巴馬（Barack Hussein Obama）總統時改變了這個模式。歐巴馬總統、拜登（Joseph Robinette Biden Jr.）總統、以及川普（Donald John Trump）的總統圖書館，其紙本紀錄和文物實際上都存放在馬里蘭州大學公園市（College Park）的這棟建築（NARA 總部）內。這對 NARA 來說很新鮮，因為這棟建築傳統上是以存放檔案文件為主，現在則開始存放大量的禮品和文物。

歐巴馬決定不建造傳統設施的原因之一，是因為他是第一位在其任內絕大多數紀錄均為「原生數位」檔（Born digital，意指資料的生成時即以數位的形式存在，包括照片、影片、電子檔案等）的總統。他衡量了若要建造符合 NARA 高標準保存條件的實體檔案庫及圖書館所需的籌款壓力。因為根據法律，必須籌集相當於建築成本 60% 的維護基金，這是一個巨大的財務挑戰。因此，他決定協助 NARA 將少量的紙本紀錄數位化，讓其圖書館成為歷史上首個「數位資料總統圖書館」。歐巴馬總統在芝加哥建立的是「總統中心」（Presidential Center），為私人機構，並非聯邦建築，NARA 會將出借實體文件與文物給該中心用於策展。

陳儀深館長提問，在參訪杜魯門總統（Harry S. Truman）、雷根總統（Ronald Wilson Reagan）等圖書館時，發現各總統圖書館的經營管理模式似乎不太一樣？例如，杜魯門總統圖書館似乎是由基金會主導管理？

John Hamilton 說明，所有總統圖書館的檔案管理與運作，嚴格來說都是由 NARA 負責，使用聯邦政府的預算，工作人員也都是由 NARA 聘任的政府員工。

不過，各總統圖書館的私人基金會在不同程度上提供支援。例如，杜魯門總統基金會主要支援教育計畫，舉辦教育推廣活動；雷根總統基金會擁有並管理巨大的「空軍一號館」博物館，與聯邦檔案建築是分開的；小布希總統基金會與 NARA 達成協議，由基金會接手管理博物館營運；詹森（Lyndon Baines Johnson）總統基金會與圖書館的合作非常緊密，共同營運設備與建築。

陳儀深館長提問，關於重要人物檔案文件的所有權是如何歸屬？例如，國務卿杜勒斯（John Foster Dulles）作為重要的政府官員，但他的檔案文件卻在普林斯頓大學？

John Hamilton 說明，這是個複雜的情況。《總統紀錄法》（Presidential Records Act）從雷根總統時期才開始實施，按照規定總統及其幕僚的官方紀錄在卸任當天即屬於美國人民並由 NARA 負責管理。在雷根之前的歷任總統，檔案文件是總統以「捐贈」形式，移轉給 NARA 的。杜勒斯擔任國務卿時期的官方紀錄會收藏在國務院移轉給 NARA 的檔案中，但他的個人文件屬於個人財產，其選擇捐給了普林斯頓大學。而且作為補充，聯邦政府產生的所有檔案文件等紀錄，最終只有約 3% 到 5% 會被評定為具有永久保存價值並由 NARA 收藏。

John Hamilton 說明，NARA 知道研究者必須奔波各地很辛苦，因此數位化是關鍵。目前的挑戰是，我們的藏品規模極為龐大，只能制訂計劃依序將收藏物品數位化。例如，NARA 預計在今年年底前將 26.8 萬捲的縮影軟片數位化，並上網提供存取。因為對 30 歲以下的研究者來說，如果資料未能上網，似乎它就不存在。雖然數位化路很漫長，但透過 OCR（Optical Character Recognition，光學字元辨識）技術，未來研究者可以在資料庫內進行全文檢索，而不僅僅是依靠傳統的對於檔案文件的關鍵字描述。

廖文碩處長提問，本次調查蒐集美國國家檔案館二館藏臺灣法律地位相關尚未數位化上網資料，及檔案群 84 美國國務院外交使團檔案中 1950 年代臺灣相關資料，感謝貴館人員 1 個月前已惠予專業意見。相關檔案是否可能以館際合作或價購方式提供本館？

文獻研究服務主管 Timothy Enas 說明，NARA 工作人員可透過電子郵件、電話或影片提供參考諮詢服務，協助研究者規劃和準備訪問事宜，並確定需要查閱的檔案文件。強烈建議研究者提前諮詢，並詳細描述研究需求，以確保所需檔案文件已入藏館內，抵達後即可查閱，所有疑問都能事先或當場得到解答。NARA 並提供針對個別研究主題的專家諮詢與文件複製服務，有關費用等詳細規定請參見官網。

陳儀深館長表示，我們目前的研究目標是關於戰後臺灣的地位，以及 1950 年代第七艦隊在臺海危機中的角色。我們發現很多相關檔案文件尚未整理或是沒有解密？

John Hamilton 回復，這確實是挑戰。檔案文件通常是按照移交給我們時的原始編排存放的。有時研究者會調閱幾十年來都沒人開過的檔案儲存箱，這既令人沮喪也令人興奮。而關於檔案文件的解密問題，NARA 設有國家解密中心（National Declassification Center，簡稱 NDC），協助與國防部或中央情報局（Central Intelligence Agency，CIA）溝通，加速檔案的審查與開放。



國史館考察團與國家檔案館二館主管座談。



陳儀深館長致贈國史館館藏麥克阿瑟、杜勒斯等訪臺時的照片。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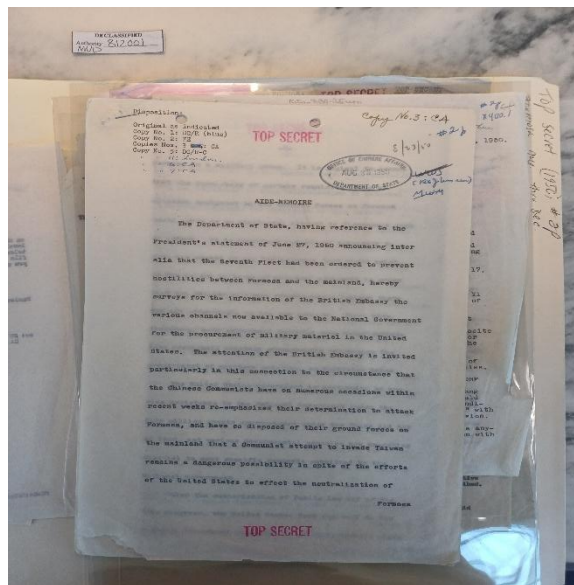


考察團與NARA 主管座談後合影

(三) 美國國家文書暨檔案總署藏臺灣法律地位、戰後臺美關係等相關檔案史料調查蒐集



國史館考察團蒐集檔案



蒐集資料舉隅

(一) 蒐集資料標的

本次調查蒐集臺灣法律地位、戰後臺美關係等近期解密開放之檔案史料，蒐集標的包括二戰期間及戰後初期美國太平洋艦隊總司令（CINCPAC）及其參謀人員檔案，涉及太平洋艦隊的作戰行動，以及軍事政府和占領問題；美國外交和軍事人員關於中國內部政治事務和美國對華外交政策備忘錄、報告、摘要和電報，主要集中於中國內戰的軍事和政治層面以及美國對衝突的干預，1949 年白皮書簡報資料以及與東南亞、香港、韓國和臺灣等地相關的資訊；1949 年至 1953 年

美國駐華大使館撤離中國大陸期間及駐臺北總領事館與其後大使館檔案，含電報、備忘錄、報告以及與華盛頓國務院的其他往來信函，內容涵蓋臺灣政治、經濟和政府事務、臺美雙邊關係以及使館官員認為可能影響美國利益的其他事項。依美國國家文書暨檔案總署目錄條列如下。

Series Secret and Top Secret Files Relating to Military Government and Civil Affairs, 1943–1947. Record Group 313: Records of Naval Operating Forces; 8 Boxes. Creator: Department of the Navy. U.S. Pacific Fleet. Office of the Commander in Chief. 1/1940-9/18/1947.

Series Top Secret Subject Files, 1945–1950. Record Group 59: General Records of the Department of State Boxes 12-19. Creator: Department of State. Bureau of Far Eastern Affairs. Office of Chinese Affairs. 1949-1961.

Series Subject Files: POL 32-1 Territorial Claims, Legal Status of Taiwan (Lot File 75D76). Record Group 59: General Records of the Department of State. Creator: Department of State. Bureau of East Asian and Pacific Affairs. Office of the Country Director for the Republic of China. 11/1/1966-1979.

Series Central Files: Legal Status of Formosa. Record Group 59: General Records of the Department of State. Creators: Department of State. Bureau of Far Eastern Affairs. Office of East Asian Affairs. 1962-1966; Department of State. Bureau of Far Eastern Affairs. Office of Chinese Affairs. 1949-1961; Department of State. Bureau of Far Eastern Affairs. Office of Northeast Asian Affairs. 9/27/1949-ca. 1961.

Series Top Secret General Records, 1949–1958. Record Group 84: Records of the Foreign Service Posts of the Department of State. Creator: Department of State. U.S. Embassy, China. 9/17/1935-2/28/1979 (Most Recent).

Series Telegrams Sent and Received, 1949. Record Group 84: Records of the Foreign Service Posts of the Department of State. Creator: Department of State. U.S. Consulate, Taipei, China. 1945-ca. 1979.

Series Top Secret Telegrams, 1949. Record Group 84: Records of the Foreign Service Posts of the Department of State. Creator: Department of State. U.S. Consulate, Taipei, China. 1945-ca. 1979.

(二) 未刊史料舉隅

1. 國務院對國家安全會議第 37/3 號文件的評論（1949 年 2 月 24 日）

[全文照錄並中譯如下：]

DEPARTMENT OF STATE COMMENT ON NSC 37/3

The NSC at its 33rd meeting on February 3, 1949, "agreed that the Joint Chiefs of Staff should be requested to furnish the Council an estimate of the extent of the threat to U.S. security in the event that diplomatic and economic steps to deny communist domination of Formosa prove insufficient, and recommendations as to what, if any, military measures should be taken in that event." (NSC Action No. 179b)

The JCS reply (NSC 37/3) is now at hand. The only portion of the JCS paper which appears to address itself directly to the question posed by the NSC reads as follows:

"In spite of Formosa's strategic importance, the current disparity between our military strength and our many global obligations makes it inadvisable to undertake the employment of armed force in Formosa, for this might, particularly in view of the basic assumption that diplomatic and economic steps have failed, lead to the necessity for relatively major effort there, thus making it impossible then to meet more important emergencies elsewhere. In this connection the distinction between the Formosan problem and the Iceland situation, where direct action is contemplated, if necessary to prevent Communist control, lies in the fact that Iceland is directly vital to our national security while the importance of Formosa cannot be said to be in that category."

The foregoing statements suggest that the JCS feels that no major military measures should be taken in the event that diplomatic and economic steps prove insufficient to deny communist domination of Formosa. It is requested that, if the JCS does not concur in this interpretation, it elucidate its position further.

In the latter half of the JCS paper, the recommendation is made that "minor numbers of fleet units be maintained at a suitable Formosan port or ports, with shore activities associated therewith limited to those necessary for maintenance, air communication and recreation, and that the mission of these units be that of exerting, in support of approved diplomatic and economic objectives, all possible stabilizing influence without the employment of force." At the same time the JCS recognizes that "unfavorable diplomatic repercussion might result from undue resort to what might be termed a show of force". On balance, however, they believe that "every reasonable effort should be made to keep Formosa in friendly hands, and that diplomatic risks and difficulties are thus justified."

It has been the consistent position of the Department of State, as set forth in the NSC 34 series, in NSC 11/2 and NSC 37/1, that the establishment of US military forces on Formosa in the present situation would be not only diplomatically disadvantageous but also, and far more importantly, a heavy political liability for us. As has been pointed out, US bases--and the same holds true for a show of naval and air strength--are an

exceedingly dubious prophylaxis against Communist infection of a teeming Asiatic population. American gunboats cannot prevent infiltration and agitation. American aircraft cannot forestall insurrections or conspiratorial negotiations between Communist emissaries and Nationalist commanders on Formosa-- wherein lie the greatest danger of communist capture of power. A show of American force in Formosa at this time not only cannot prevent the real state of the situation, but may even increase them. The repercussions of such an action would spread into the great expanse of continental China, raising the specter of an American-created irredentist issue just at the time we shall be seeking to exploit the genuinely Soviet-created irredentist issues in Manchuria and Sinkiang. We cannot afford to compromise an emerging new US position in China by ineffectual military measures in Formosa.

The Department of State, therefore, fails to understand the efficacy of the proposal of the Joint Chiefs of Staff that US naval vessels and aircraft make a show of force at the present time in Formosa.

What has been said above should not, however, exclude the contingency that US forces might in the future be required to act in Formosa in collaboration with other friendly forces. If the US is to intervene militarily in the island, it should do so only in concert with like-minded powers, preferably through UN mechanisms, and with the proclaimed intention of satisfying the legitimate demands of the indigenous Formosans for self-determination under a UN trusteeship or through independence.

1949 年 2 月 3 日，國家安全會議第 33 次會議「同意要求參謀首長聯席會議向委員會提供一份評估報告，說明如果透過外交和經濟手段阻止共產主義控制臺灣的措施不足以應對威脅，美國安全將面臨何種程度的威脅，並就此情況下應採取何種軍事措施（如有）提出建議。」

參謀首長聯席會議的答覆（國家安全會議第 37/3 號文件）現已提交。參謀本部文件中唯一直接回應國家安全會議提出的問題的部分如下：

「儘管臺灣具有重要的戰略意義，但鑒於我國軍事實力與眾多全球義務之間的不平衡，不宜在臺灣動用武力。尤其是在外交和經濟手段均已失效的前提下，動用武力可能導致在臺灣投入相對巨大的力量，從而使我們無法應對其他地區更為重要的緊急情況。」

上述陳述表明，參謀本部認為，如果外交和經濟手段不足以阻止共產主義控制臺灣，則不應採取任何重大軍事措施。如果參謀本部不同意這種解讀，請進一步闡明其立場。

在參謀本部文件的後半部分，建議「在臺灣合適港口保留少量艦隊艦艇，相關岸上活動僅限於必要的維護、空中通訊和娛樂活動，這些艦艇的任務是在不訴諸武力的情況下，為支持已批准的外交和經濟目標，發揮一切可能的穩定作用」。同時，參謀本部也承認「過度訴諸武力展示可能會產生不利的外交後果」。但整

體而言，他們認為「應盡一切合理努力確保臺灣保持在友好國家手中，因此，承擔外交風險和克服外交困難是合理的」。

上述陳述表明，參謀本部認為，如果外交和經濟措施不足以阻止共產主義控制臺灣，則不應採取重大軍事行動。如果參謀本部不同意此解釋，請進一步闡明其立場。

在參謀本部文件的後半部分，建議「在臺灣合適的港口保留少量艦隊，相關岸上活動僅限於維護、空中通訊和娛樂等必要活動，這些艦隊的任務是在不訴諸武力的情況下，為支持已批准的外交和經濟目標，發揮一切可能的穩定作用」。同時，參謀本部也承認，「過度訴諸武力展示可能會產生不利的外交後果」。但總的來說，他們認為「應盡一切合理努力使臺灣保持在友好國家手中，因此，承擔外交風險和克服外交困難是合理的」。

國務院一貫的立場，正如國家安全會議第 34 號系列文件、第 11/2 號文件和第 37/1 號文件所述，在當前形勢下，在臺灣建立美軍基地不僅在外交上不利，而且更重要的是，會給我們帶來沉重的政治負擔。正如先前所指出的，美國軍事基地——以及展示海空軍實力——對於防止共產主義勢力滲透到人口稠密的國民黨地區而言，是一種極其可疑的預防措施。美國砲艇無法阻止滲透和煽動。美國飛機也無法阻止叛亂，也無法阻止共產主義特使與國民黨指揮官在臺灣進行密謀談判——而這正是共產主義奪取政權的最大隱患所在。此時在臺灣展示美國武力不僅無法改變現狀，甚至可能加劇局勢。此類行動的影響將波及廣大的中國大陸，在我們正尋求利用蘇聯在東北和新疆製造的領土收復問題之際，卻又會引發美國製造的領土收復問題。我們不能因為在臺灣採取無效的軍事行動而損害美國在中國正在形成的新地位。

因此，國務院未能理解參謀首長聯席會議提出的美國海軍艦艇和飛機目前在臺灣進行武力展示的建議的有效性。

然而，上述論點並不排除未來美國軍隊可能需要與其他友好國家合作在臺灣採取行動的可能性。如果美國要對該島進行軍事干預，則必須與志同道合的國家合作，最好是透過聯合國機制，並公開宣稱其目的是滿足臺灣原住民在聯合國託管下或透過獨立實現自決的合法訴求。

2. 國務院中國事務辦公室與聯合國事務局（Bureau of United Nations Affairs）就儘早將臺灣問題提交聯合國討論備忘錄（1949 年 6 月 9 日）

[全文照錄並中譯如下：]

Discussions with UNA with regard to the possible presentation of the case of Formosa to the UN at a very early date bring out that:

1. By rather seriously stretching the Charter, the Trusteeship Council could place the item on its agenda but could not take action until it had been placed before the Fourth session of the Assembly in September. This plan has serious disadvantages:
 - (a) it might meet serious opposition as a unilateral attempt by the United States to stretch the Charter to cover political motivations;
 - (b) it would put the Communists on warning; and
 - (c) as it could not be accompanied by effective immediate action, would allow large scale Communist infiltration and preparations for a coup d'etat to prevent eventual enforcement.
2. Presentation to the Security Council. This would require proof of a threat to the peace, immediate or potential. Under present circumstances this might invite endless debate and delaying tactics and in the end be subject to U.S.S.R. and present Chinese delegation veto -- thus impracticable.
3. A request from the United States preferably associated with other friendly governments, and necessarily with United Kingdom concurrence as a signer of the Cairo Declaration, for a special session of the General Assembly at once, specifically to consider the case of Formosa, threatened as it is by dangers of anarchy, civil war and aggressive action from beyond its borders, and calling for a UN plebiscite to determine the wishes of the Formosans as to their future. UNA agrees that this course is feasible and that it could be achieved probably within a matter of two weeks if this Government considered the case of such importance as to place it so dramatically before the UN and the world. FE considers that such a presentation is not only Justified but that it may well offer the sole fast and practicable means to deny the island to the Communists; the determined objective approved by the NSC and the President.

This course has the further advantages:

The presentation of the full case with a categorical denial of any desire by the United States for military or other special privileges on the island should command the Sympathetic support of the majority of the members of the UN, would be in the best tradition of American championship of the rights of oppressed peoples, and should command the overwhelming support of the American people. For reasons of comity, it has not been possible publicly to present the sorry deterioration which has progressively and rapidly brought the island to the verge of ruin. The accelerated disintegration and dispersion of the elements of the Nationalist Government remaining, indicate that no effective corps of that government can long exist. Those remaining, including the present governors of Formosa, must be considered as isolated remnants of a government which has in fact ceased effectively to exist. The characteristics of these remnants can

offer no hope for solution of the Formosa problem, and can but accelerate revolt or provide conditions for a Communist takeover.

The course suggested would indubitably offer an immense stimulus to the Formosans' hope for self-determination, thus leading them to resist Communist approaches -- a course of desperation which our reports indicate is present and real.

Neither the Communist regime, the remaining elements of the Nationalist Government, nor unfriendly third powers could very well take exception to an action so clearly in accord with the principles of the UN and international morality without laying their motives open to suspicion.

The concomitants to this action would be:

Urgent consultation with the United Kingdom Government looking to modification of the Cairo Declaration by joint or simultaneous action, accompanied by a reasoned public declaration by each of the two governments of the developments since 1943 which have disappointed the hopes of the two governments and which have now reached such a point that the provisions of the Declaration serve only to subject the Formosan people to suppression of their long-held aspirations for self-government, in conditions of misery and despair.

There is ample evidence that these conditions will lead to revolt, bloody suppression and conditions of chaos which could endanger the peace and the security of the United States.

The Cairo Declaration was issued in the names of President Roosevelt, Generalissimo Chiang Kai-shek and Prime Minister Churchill. Generalissimo Chiang no longer is active in the Chinese Government. For the reasons given United Kingdom concerned in the substance of the Declaration. there appear to be only the United States and the United Kingdom concerned in the substance of the Declaration.

1. Urgent preparation of a White Paper on Formosa to be released simultaneously with the presentation of the issue to the UN.
2. Immediately after agreement with the United Kingdom and the determination to present the case, diplomatic consultation with as many friendly governments as possible to ensure an understanding of the case and to indicate our desire for multilateral consultation, and participation of like-minded nations.

Consideration of approaches to governments likely to be sympathetic cosponsors of the resolution, preferably those countries such as the Philippines, Australia and Siam who have manifested an active interest in the welfare of colonial peoples.

與聯合國事務局儘早將臺灣問題提交聯合國討論後發現：

1. 透過對《聯合國憲章》進行相當程度的曲解，託管理事會可將該議題列入議程，但必須等到 9 月提交大會第四屆會議後才能採取行動。此方案存在嚴重缺陷：(a) 可能遭到強烈反對，被視為美國單方面試圖曲解《聯合國憲章》以掩蓋其政治動機；(b) 引起共產黨的警覺；(c) 由於無法立即採取有效行動，將導致共產黨大規模滲透，並可能策劃政變以阻止最終的執行。
2. 提交安全理事會。這需要證明對和平的直接或潛在威脅。在目前情況下，可能會導致無休止的辯論和拖延戰術，最終可能受到蘇聯和中國代表團的否決，因此不切實際。
3. 美國（最好與其他友好國家政府一同）請求立即召開聯合國大會特別會議，專門審議臺灣問題。臺灣正面臨無政府狀態、內戰以及境外侵略的威脅，因此呼籲舉行聯合國公投，以決定臺灣人民對未來的意願。聯合國事務局認為此舉可行，如果美國政府重視此事，並將其如此隆重地提交給聯合國和世界審議，則可能在兩週內實現。聯合國認為，這樣的提議不僅合情合理，而且很可能是唯一能夠迅速有效地阻止共產黨占領臺灣的途徑；這一既定目標已獲得國家安全會議和總統的批准。

本方案還有以下優勢：全面闡述案情，並斷然否認美國企圖在臺灣島謀取任何軍事或其他特殊權利，理應贏得聯合國大多數成員國的同情支持，符合美國捍衛被壓迫人民權利的優良傳統，並應贏得美國人民的壓倒性支持。出於禮讓，我們一直未能公開披露臺灣島日益惡化的局勢，而這種惡化已使臺灣島瀕臨毀滅。國民政府殘餘勢力的加速瓦解和分散表明，該政府的任何有效機構都無法長期存在。包括現任臺灣總督在內的殘餘勢力，只能被視為一個實際上已經名存實亡的政府的孤立殘餘。這些殘餘勢力的現狀無法為解決臺灣問題帶來任何希望，只會加速叛亂或為共產黨奪權創造條件。

所建議的方案無疑會大大激發臺灣民眾爭取自決的希望，從而促使他們抵制共產主義路線——我們的報告顯示，這種絕望的傾向確實存在。

無論是共產主義政權、國民政府殘餘勢力，或是不友善的第三國，如果對一項如此明顯符合聯合國原則和國際道德準則的行動提出異議，都難免會暴露其動機的可疑之處。

採取此行動的伴隨措施包括：與英國政府緊急磋商，尋求透過聯合或同步行動修改《開羅宣言》，同時兩國政府各自發表公開聲明，闡述自 1943 年以來事態發展如何令兩國政府失望，並已發展到如此地步：《開羅宣言》的條款只會使臺灣人民長期追求自治的苦難遭受壓制。有充分證據表明，這些狀況將導致起義、血腥鎮壓和混亂局面，從而危及美國的和平與安全。

《開羅宣言》是以羅斯福總統、蔣介石委員長和邱吉爾首相的名義發表的。蔣介石委員長已不再擔任中國政府職務。鑒於上述原因，似乎只有美國和英國參與了宣言的實質內容。

1. 緊急起草一份關於臺灣問題的白皮書，與向聯合國提交該問題同時發布。

2. 在與英國達成協議並決定提交該議題後，立即與盡可能多的友好國家政府進行外交磋商，以確保各方理解該議題，並表明我們希望進行多邊磋商，以及志同道合的國家參與。
3. 考慮與可能成為該決議的同情共同提案國的政府接洽，最好是那些對殖民地人民福祉表現出積極興趣的國家，例如菲律賓、澳大利亞和泰國。

3. 與英國駐美國大使館參事格雷夫斯（H. A. Graves）會談備忘錄（1949年12月6日）

[全文照錄並中譯如下：]

Mr. Graves called this afternoon at his request and, after handing Mr. Merchant the attached memorandum regarding Formosa, dated December 6, 1949, explained that the Foreign Office had instructed the Ambassador to take up with the Secretary of State certain questions relating to Formosa. He said that since the Ambassador was out of town temporarily and would not return for a day or two he was bringing this matter to the Department attention. Mr. Graves requested that the Secretary be informed of the British action in this matter inasmuch as the British Ambassador hoped to call on the Secretary within the next few days.

Mr. Graves briefly reviewed the concern previously expressed by the British Government, both in Washington and in London, regarding provision of military supplies to the National Government and the danger that these supplies would eventually fall into Chinese Communist hands. He pointed out that the British were particularly concerned with the shipment of tanks and planes for Formosa and expressed apprehension lest the Chinese Communists might eventually be in a position to use such equipment against Hong Kong and/or French Indochina. Mr. Graves recalled that Mr. Bevin and Mr. Schuman had expressed their concern along these lines to the Secretary at Paris in November but that he did not know what reply the Secretary had made. He said the British Government was interested in knowing whether the U.S. Government was disposed to halt the shipment of military materiel to Formosa at this time and what the views of the U.S. were regarding Formosa, what information regarding U.S. policy toward Formosa could be told to the British Government and what the U.S. Government expected to do about Formosa.

Mr. Merchant briefly reviewed current U.S. policy toward Formosa. He said that, emphasizing he was speaking in the strictest confidence, the highest U.S. military authorities after studying the strategic importance of Formosa had reached the conclusion that U.S. armed forces should not be employed for the defense of the island.

Mr. Merchant continued that about a month ago we had authorized the U.S. Consul General at Taipei to approach the Generalissimo and made clear to him that the U.S. Government had no intention of using its armed forces for the defense of the island. This step had been taken in an effort to impress upon the Generalissimo and his associates the need for energetic efforts on their own part if they were to be successful in denying the island to the Chinese Communists. Mr. Merchant pointed out it was the U.S. Government's belief that sufficient military, economic and financial resources were available on the island to the Chinese Government to enable it to make a successful defense of Formosa and that the prime requisite was the will to stand off the Communists. In answer to Mr. Graves' query whether the U.S. Government's attitude regarding Formosa now differed from that expressed to Mr. Denning in September, when the latter was in Washington, Mr. Merchant replied that under existing circumstances it seemed likely the Chinese Communists would eventually be able to take over the island but that there was a hope that the Nationalists might so exert themselves as to prevent such an eventuality. Mr. Sprouse explained that it was the U.S. Government's view that the only guarantee of the island's denial to the Chinese Communists lay in U.S. military occupation of Formosa.

He asked whether the British Government had any suggestions as to how this might be accomplished and what its views were with regard to Formosa. Mr. Graves replied the British Government's views had just been stated and that the British Government believed, as did the U.S. Government, that all the essential ingredients for successful defense of the island were available to the Chinese Government. He added it was the British view, however, that the Communists would probably gain the island within the next few months.

With respect to the furnishing of military materiel to the Chinese Government on Formosa, Mr. Merchant explained that the materiel now going forward to Formosa consisted of shipments under the \$125 Million Grants as well as supplies purchased by the Chinese with their own funds. He further stated that this was a relatively small amount, particularly with respect to planes, compared to the materiel already on the island.

When Mr. Graves expressed the opinion that it seemed paradoxical to continue shipments of military material when it was believed that the Chinese Communists would eventually capture the island, Mr. Merchant pointed out that the U.S. Government desired to take all feasible and practicable steps to assist the Chinese Government in preventing Communist occupation of the island and that by so doing it was, on the one hand, possible that the island might be successfully defended and, on the other hand, such action was at least buying time, Mr. Merchant concluded he did

not believe that the U.S. Government would be disposed to take steps to halt the shipment of military materiel now going to Formosa for the Chinese Government.

格雷夫斯先生今天下午應莫成德先生〔Livingston I. Merchant，副遠東事務助理國務卿〕的要求前來拜訪，並遞交了附上的關於臺灣的備忘錄（日期為 1949 年 12 月 6 日）。隨後，格雷夫斯先生解釋說，外交部已指示大使就臺灣相關事宜與國務卿進行溝通。他表示，由於大使暫時出差，一兩天內不會返回，因此他特此將此事提請外交部注意。格雷夫斯先生請求將英國方面在此事上的行動告知國務卿，因為英國大使希望在未來幾天內拜訪國務卿。

格雷夫斯先生簡要回顧了英國政府先前在華盛頓和倫敦表達的擔憂，即向在臺灣的國民黨政府提供軍事物資，以及這些物資最終可能落入中國共產黨手中的風險。他指出，英國尤其關注運往臺灣的坦克和飛機，並擔心中國共產黨最終可能會利用這些裝備攻擊香港和/或法國印度支那。格雷夫斯先生回憶說，貝文先生〔Ernest Bevin，英國外相〕和舒曼先生〔Robert Schuman，法國外交部長〕曾在 11 月於巴黎向國務卿表達過類似的擔憂，但他不知道國務卿的答覆是什麼。他說，英國政府想知道美國政府是否打算在這個時候停止向臺灣運送軍事物資，美國對臺灣的看法是什麼，英國政府可以了解哪些關於美國對臺灣政策的信息，以及美國政府打算如何處理臺灣問題。

莫成德先生簡要地回顧了美國目前對臺灣的政策。他強調，他是在絕對保密的情況下透露，美國最高軍事當局在研究了臺灣的戰略重要性後得出結論，美國武裝部隊不應被用於保衛該島。莫成德先生繼續說道，大約一個月前，我們授權美國駐臺北總領事與臺灣總司令接洽，並明確表示美國政府無意動用其武裝部隊保衛臺灣。此舉旨在讓臺灣總司令及其同僚意識到，如果他們想要成功阻止中國共產黨占領臺灣，就必須採取積極主動的措施。莫成德先生指出，美國政府認為，臺灣擁有足夠的軍事、經濟和財政資源，足以讓中國政府成功保衛臺灣，而首要條件是必須有決心抵禦共產黨的攻擊。針對格雷夫斯先生提出的美國政府目前對臺灣的態度是否與德寧先生〔Esler Dening，英國外交官〕9 月在華府時所表達的態度有所不同的詢問，莫成德先生回答說，在目前情況下，中國共產黨最終很可能能夠占領該島，但希望國民黨能盡力阻止這種情況的發生。史普勞斯先生〔Philip D. Sprouse，中國事務辦公室主任〕解釋說，美國政府認為，阻止中國共產黨占領臺灣的唯一保障在於美國對臺灣的軍事占領。

他詢問英國政府對如何實現這一目標有何建議，以及對臺灣問題有何看法。格雷夫斯先生回答說，英國政府剛才已經表達了他們的觀點，並且英國政府和美國政府一樣認為，中國政府已經具備成功保衛臺灣所需的一切必要條件。但他補充說，英國方面認為，共產黨很可能在未來幾個月內攻占臺灣。

關於向臺灣中國政府提供軍事物資的問題，莫成德先生解釋說，目前運往臺灣的物資包括根據 1.25 億美元的贈款運送的物資，以及中國方面自籌資金購買

的物資。他也指出，與島上已有的物資相比，這筆物資的數量相對較少，尤其是在飛機方面。

當格雷夫斯先生表示，既然人們相信中國共產黨最終會占領該島，那麼繼續運送軍事物資似乎就顯得自相矛盾時，莫成德先生指出，美國政府希望採取一切可行和實際的措施來協助中國政府防止共產黨占領該島，這樣做一方面有可能成功保衛該島，另一方面至少可以爭取時間。莫成德先生總結說，他不認為美國政府會願意採取措施阻止目前運往臺灣、供中國政府使用的軍事物資。

4. 國務院中國事務辦公室有關美國對聯合國臺灣問題案應採取立場報告 **(1950年11月1日)**

[全文照錄並中譯如下：]

Problem:

To determine the position which should be taken by the U.S. in connection with the projected consideration by a commission of the General Assembly of the long-term problem of Formosa.

問題：

確定美國在聯合國大會委員會預計將審議臺灣長期問題時應採取的立場。

Introduction:

The U.S. believes that the long-term problem of Formosa should be considered by a commission of the General Assembly, and would employ UN machinery with a two-fold purpose: (1) to obtain wider international support for the military neutralization of Formosa pending a solution of the Korean crisis and (2) to use the machinery of the United Nations in order to arrive at a peaceful and generally acceptable settlement of the future status of Formosa. It is conceived that the first objective may be achieved by the General Assembly's establishing a commission to study the problem and at the same time calling upon all interested parties to refrain from the use of force while the question is under study. We shall have to be receptive toward the views of other friendly countries and willing to compromise, if we are successfully to elicit their support for our neutralization objective. In striving toward the second objective we shall have to formulate our own views of what the future political status of Formosa should be. The formulation of these views and the arriving at a cleared U.S. Government position on this controversial question is a complicated and time-consuming task. It is evident that we shall have to take a stand on this question in the course of consideration of the problem by the projected United Nations commission and that it would be of considerable tactical value to have as soon as possible a general idea of the solution we

shall support in the United Nations commission. The purpose of this paper is primarily the formulation of a tentative U.S. position with respect to the substantive question of the political status of Formosa.

It seems probable that the problem, being so tough in nature, will require a substantial period of time for settlement. The political situation is such that this might be even advantageous: The very passage of time possibly may contribute to solution -- or at least decision.

前言：

美國認為，臺灣長期問題應由聯合國大會的一個委員會審議，並將利用聯合國機制實現兩個目標：(1) 在韓戰危機解決之前，爭取更廣泛的國際支持，以軍事手段中立臺灣；(2) 利用聯合國機制，就臺灣未來地位達成和平且普遍可接受的解決方案。我們認為，第一個目標可以透過聯合國大會設立一個委員會來研究這個問題，同時呼籲所有相關各方在問題研究期間避免使用武力。如果我們想要成功爭取其他友好國家對我們中立目標的支持，就必須認真聽取它們的意見，並願意做出妥協。為了實現第二個目標，我們必須闡明我們自己對臺灣未來政治地位的看法。闡明這些看法並就這一爭議性問題達成美國政府明確的立場是一項複雜且耗時的任務。顯然，在即將成立的聯合國委員會審議該議題的過程中，我們必須就此議題表明立場。儘早對我們將在聯合國委員會中支持的解決方案有一個大致的了解，將具有重要的策略價值。本文的主要目的是就臺灣政治地位這一實質問題，闡述美國的初步立場。

鑒於該問題的複雜性，解決它可能需要相當長的時間。當前的政治情勢甚至可能有利於問題的解決：時間的流逝或許有助於問題的解決，或至少有助於做出決定。

U.S. Desiderata Respecting a Formosa Settlement:

From the standpoint of U.S. interests, any proposed solution of the Formosa question should take into account the following U.S. desiderata:

1. From a security standpoint, the U.S. seeks a solution which would prevent the establishment of hostile military bases on Formosa.
2. From a political standpoint the U.S. seeks a solution which:
 - (a) is generally acceptable to its friends and allies;
 - (b) commands widespread support in Asia;
 - (c) will not make of Formosa a permanent focus of friction and conflict;
 - (d) will contribute to the achievement of U.S. objectives respecting China; and
 - (e) does not disregard previous U.S. commitments.

It is realized, of course, that any specific solutions will bring, in varying degrees, some conflict among the above factors. They are nevertheless considerations which should

be taken into account in evaluating any proposed solution, and taken together they constitute the theoretical optimum of what we seek respecting Formosa.

美國有關臺灣處置協議的訴求：

從美國利益的角度來看，任何關於臺灣問題的解決方案都應考慮以下幾點：

1. 從安全角度來看，美國尋求的解決方案應能防止敵對勢力在臺灣建立軍事基地。2. 從政治角度來看，美國尋求的解決方案應：(a) 普遍為美國盟友所接受；(b) 在亞洲廣受支持；(c) 不會使臺灣成為長期摩擦與衝突的焦點；(d) 有助於實現美國對華目標；以及 (e) 不違背美國先前所做的承諾。當然，我們也意識到，任何具體的解決方案都會在不同程度上導致上述因素之間的衝突。然而，在評估任何建議的解決方案時，這些因素都應予以考慮，並且綜合起來，它們構成了我們對臺灣問題的理論最優方案。

Analysis:

There are certain basic factors in the Formosa situation which must be kept in mind in any consideration of possible solutions of the question. The following may be listed: (1) The power potential of mainland China is so much greater than that of Formosa that any regime on the latter which seeks to continue the separation of Formosa from mainland China will ultimately fall unless it is supported by outside forces. The imbalance between military potential in at present redressed temporarily by commitment of U.S. forces. (2) Any attempt to deny Chinese sovereignty over Formosa in any guise would be bitterly resented by the Chinese people. (3) Neither the Chinese Communist regime nor any other Chinese regime will renounce China's claim to Formosa. If that claim is denied the Chinese Communist can be expected to use all means at their disposition, including propaganda, subversion, sabotage, terrorism, and very possibly overt military force, to bring about its incorporation into China. (4) The National Government is discredited in the eyes of most Chinese and certain vitally interested foreign Governments.

Alternatives for the long-range political status of Formosa can be divided into two general categories: (1) the recognition of Chinese claims and the incorporation of Formosa into China with or without attendant conditions, and (2) the separation of Formosa from China either as an independent state a UN trusteeship, or as a part of Japan.

In view of the weakness of the National Government and the possibility that the Peiping regime may in the more or less early future be accepted by the United Nations as the Government of China, there is a clear danger that alternative (1) would in fact result in the incorporation of Formosa into Communist China. Consequently this alternative would be the least satisfactory from the standpoint of U.S. military security

requirements. It would normally nevertheless have to be accented, if a UN settlement demanded such solution.

On the other hand if alternative (2) is adopted some means must still be provided for preventing the engulfment of Formosa by China. If, as stated above, China will not relax its efforts to incorporate Formosa and Formosa itself has not the strength to prevent this, protection from China must be provided from without. This protection might be afforded by the United Nation on the principle of collective security. However, the concept of collective security of the United Nation is relatively new and only partially established. That this principle, if not backed by effective force, would deter an irredentist China from resorting to force is by no means assured. Formosa would present a comparatively weak case for the application of this principle because of the widespread feeling, even among the non-Communist states, that China has a valid claim to the island. The majority of UN members, unless convinced by overwhelming evidence that Communist China was a potential international lawbreaker who should be restrained, would probably be most reluctant to commit themselves to the defense of Formosa. If the U.N. played a leading role in having the UN assume responsibility for the protection of Formosa, a situation would be created in many essential respects analogous to that which existed in Korea prior to the North Korean attack. It is likely that the same reasons which led the UN and the U.S. to resist the North Korean attack would in such circumstances lead them to resist an attack by China upon Formosa, given on prior UN guarantee. If present proposals now under consideration by the UN are adopted with respect to the earmarking by members of certain contingents of their armed forces for use in case of need to provide a UN military force, this force would presumably be available to lend substance to any form of UN protectorate. However, it is probable that the U.S. would have to supply the major portion of such a force. If, as is probable, such UN forces were inadequate to meet a full scale Chinese assault, it is most unlikely that the U.S. would commit only those elements of its armed forces assigned by prior agreement to the UN without committing such additional forces as might be necessary to prevent their annihilation.

Consequently, the adoption of alternative (2) would in fact amount to committing U.S. forces in advance to the defense of Formosa against a Chinese attack. This commitment would be nonetheless real in that it would not be explicit, for should the Chinese attack Formosa the U.S. would almost inevitably commit its force to the island's defense rather than accept a staggering blow to its prestige and to the prestige of the UN. It may be concluded that assumption by the UN of responsibility for the protection of Formosa would impose a military burden on the U.S. substantially the same as though the U.S. assumed this responsibility unilaterally. Although a UN commitment for the protection of Formosa would provide a much more favorable political atmosphere for the

employment of U.S. forces, the military burden would be no less. Whether or not the burden would be greater than we care to assume in the light of other commitments in more important theaters of conflict, would be a high military policy decision.

The position which the U.S. may take with respect to the disposition of Formosa has grave political implications.

The U.S. in the Cairo Declaration stated that it was its purpose that Formosa and the Pescadores should be returned to the Republic of China. This purpose was reaffirmed by the U.S. at Potsdam and by the President in his public statement of January 5, 1950 respecting Formosa. In his statement of January 5 the President emphasized American good faith in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and the Secretary of state on the same day emphasized the importance of integrity in our foreign relations and said that whatever may be the legal situation, the U.S. is not going to quibble on "any lawyers' words about the integrity of its position". It is evident that the Cairo Declaration in which only the U.S., the United Kingdom and China participated, can have no binding force upon the UN in any disposition which it may decide to make of Formosa. However, it is equally clear that the intent of the Cairo Declaration is not only a matter of public knowledge, but has the approval of substantial world opinion. The Cairo Declaration must inevitably be given serious consideration in deciding the position which the U.S. can take with respect to disposition of Formosa during discussions in the UN.

It is believed that the Cairo Declaration committed the U.S. to endeavor to bring about the return of Formosa to China, and it would be inconsistent with that Declaration for the U.S. to support any measure which would separate Formosa from China. It has been argued that since the Cairo Declaration mentions "The Republic of China" rather than "China" the purpose was to restore Formosa to the National Government. It is believed that this argument is a form of "quibbling on lawyers' words" to which the Secretary referred on January 5 which would be undignified and unconvincing. If it be argued that conditions have changed substantially since 1943, that since that time the USSR has violated a number of pledges and that in view of these circumstances the U.S. is no longer bound by its commitments at Cairo, there is danger that this will be taken as adherence to the principle governing the USSR in practice, that any country should feel free to repudiate its international commitments whenever in its judgment conditions have changed. It is in any event hardly just to argue that, because the Soviet Union has repudiated commitments which it has made at Potsdam, the U.S. is therefore free to repudiate commitments which it made, not to the Soviet Union, but to China at Cairo. In essence the issue is clear. The U.S. undertook certain commitments at Cairo; as a sovereign nation the U.S. can, of course, repudiate those commitments; but it can do this only at the cost of violating its integrity and the principles for which it stands. The position taken by the secretary on January 5, 1950 is still effective.

The attitude which the U.S., taken toward the Formosa question will profoundly affect the political battle for Asia in which we are now engaged. It is of the utmost importance that we consider our attitude not only from the standpoint of our own military strategic desires, but also from the standpoint of how our attitude as formulated will be viewed by the peoples of Asia. Suspicion of Western imperialism is deep-rooted in Asia, as was clearly shown at the IPR Lucknow conference, if more proof were needed than already contained in Nehru's statements. That under present circumstances this suspicion may have for the most part an emotional rather than a logical basis makes it nonetheless dangerous. The U.S. has in some measure allayed this suspicion with respect to its own intentions by its actions respecting the Philippines and Indonesia. But latent suspicion remains and there is unquestionably a predisposition throughout Asia to interpret American moves as evidence of imperialism. The strategic importance of Formosa to the U.S. has recently been given public prominence and at least semi-authoritative approval in this country. Some opinion sees Formosa as a part of a line of bases dominating the East Asiatic coastline. In these circumstances if the U.S. initiates and supports in the UN measures designed to deprive China of Formosa (and if such measures are to be taken by the UN, the U.S. would have to initiate and strongly support them) this action would in all probability be widely interpreted in Asia as a new American act of imperialism and would go far to offset the political advantages which we have derived from our actions respecting the Philippines and Indonesia. Furthermore, the close relationship which would necessarily exist between the U.S. and Formosa, if the latter is separated from China, would itself go far toward confirming Asiatic suspicions that Formosa had become an American puppet. In these circumstances, Asiatics would probably find little difference between Soviet activities in Outer Mongolia and American activities in Formosa, except that the U.S. was able to command sufficient votes in the UN to give its imperialism a cloak or international respectability. From the standpoint of its effect upon the political battle for Asia, it is relatively unimportant that this attitude would in our eyes be quite illogical and groundless. From the political and propaganda standpoint, we must avoid placing ourselves in a position where in Asian eyes our warning of the new Soviet imperialism would be viewed as a case of the pot calling the kettle black. And, it is requisite to give due consideration to the fact that important Occidental nations also feel that Formosa must be Chinese if we are to avoid the creation of a festering core in the West Pacific. China's claim to Formosa rests upon the fact that the Manchu Dynasty exercised sovereign rights over the island from about 1684 to its cession to Japan in 1895; that the U.K., China and the U.S. formally announced at Cairo in 1943 that Formosa had been stolen from China and that it was their purpose that it should be restored to China; that the Cairo Declaration was reaffirmed in the Potsdam Proclamation, which the

Japanese accepted as a basis for surrender; that, since the Japanese surrender, the National Government of China has administered the island, incorporating it into the Republic of China as a province without protest from any of its allies; and, finally, that the native Formosan population is almost entirely Chinese.

China's claim to Formosa is strong - certainly stronger than that which any other country can assert. Probably the only challenge which could be made to China's claim would be the will of the Formosan population. Formosan wishes may thus become an important factor in UN consideration of the problem. It is probable that were a free expression of Formosan opinion possible, that opinion would at present be overwhelmingly in favor of either Formosan autonomy or some form of UN or U.S. trusteeship over the island. It is possible that by championing Formosan wishes, a means might be found for denying Formosa to Communist China. However attractive this possibility may appear at first sight, it has difficulties and costs which ought to be carefully considered. It has already been pointed out that such a move by the U.S. would constitute a political entanglement which would in fact place upon the U.S. a responsibility for the military defense of Formosa. The magnitude of this military commitment, depending directly as it would upon the strength of mainland China, cannot be estimated nor can the termination of it be foreseen. The broad political costs of violating our Cairo pledge have likewise been discussed. Probably the most acceptable basis upon which we could violate that pledge would be in support of the principle of self-determination. However, there are a number of weaknesses in the case for Formosan self-determination.

Any Formosan drive for independence from China is of recent origin and based more on considerations of present advantage than on deep ethnic urge. Formosan dissatisfaction under Japanese rule is believed to have arisen more from the belief that Formosa should be Chinese rather than that it should be independent. Immediately after VJ-Day, the Formosan population appeared well-pleased at the prospect of restoration to the "motherland". Maladministration and looting by the Nationalists, chaos on the mainland, and an antipathy toward Communism have created wide-spread dissatisfaction with Chinese rule, but this dissatisfaction has not the ethnic justification or has it yet shown the enduring strength of, say, the struggle of the Poles or the Finns to escape from the Czarist Empire. Certainly on ethnic and historical grounds, the struggle of the Tibetans or the Mongols against absorption by the Chinese stands well above that of the Formosans. Perhaps for these reasons Formosan desires for separation from China as yet have received little support in Asia, where the prevailing view seems to be that Formosa belongs to China.

The United States reaffirmed its obligations respecting Formosa as recently as January of this year. The United States raised publicly no formal voice of protest when the

Chinese Nationalist Governor Ch'en Yi, slaughtered some 10,000 Formosans and continued to support Chinese Nationalist control over Formosa although it was evident that that control was abhorrent to the native Formosan population. There is now a real possibility that the Chinese Communists are capable of seizing the island by force. It has been repeatedly emphasized publicly and semi- authoritatively in the U.S. that Chinese Communist control of Formosa would gravely threaten American security interests in the Far East. Taken together these circumstances make it particularly difficult for the U.S. to take, initially, at least, a leading part in supporting Formosan wishes against China's claim.

The U.S. could, however, strongly support the right of the Formosans as a party of direct interest to make their views known to the UN Commission. If the Formosans should state their case in such a way as to obtain strong support in the Commission, particularly among the Asiatic members, the U.S. might then with minimum political danger in Asia also support the Formosan view. In so doing it should have clearly in mind: (1) the virtual military commitment which, as discussed above, it would incur and (2) the practical difficulties of ascertaining through a UN supervised plebiscite the real wishes of the Formosans and of carrying out these wishes in the face of almost certain Chinese Nationalist opposition.

The political cost to the U.S. of initiating a UN move to give Formosa a status separate from China would be heaviest in China itself. The U.S. has heretofore been more successful than any other major power in overcoming basic Chinese anti-foreignism and in obtaining the confidence and goodwill of the Chinese people. There probably still remains in China a considerable measure of the public confidence and goodwill built up on our account over the past century. This latent goodwill, plus the basic incompatibility of Soviet ambition in China with Chinese interests, constitutes the principal long-term asset for contesting Soviet domination of China. If the U.S. should take a stand with respect to Formosa which the Chinese people would view as repudiation of its commitment at Cairo the consequences within China would be a serious blow to our long-term position. The Chinese Communists would be provided an ideal issue upon which to rally Chinese public opinion of all political shades in support of the current anti-American campaign and would be able to pose as the champion of Chinese territorial integrity and to use the American stand respecting Formosa to becloud the issue of Soviet designs on China's northern territories. (This factor was noted by the Secretary on January 12) It is likely that existing pro-American feeling in China would be dealt a grave and critical blow. An issue would be raised between the U.S. and the Chinese people which would be a major point of friction between the U.S. and any Chinese Government. Finally, it should be pointed out that any UN action separating Formosa from China, carrying with it necessarily a UN responsibility for the

protection of Formosa, could achieve by most optimistic estimate a denial of Formosa to the Communists for use as a military base. In other words, the advantages derived from such a course of action would be entirely defensive.

It would seem that of the American desiderata mentioned earlier only that relating to U.S. military security interests would be best served by a solution which separated Formosa from China and that the remaining desiderata argue strongly for UN recognition of China's claim. In view of JCS previous estimates of Formosa's strategic importance to the U.S., it is not believed that a policy of holding Formosa regardless of costs is justifiable. Consequently the heart of the Formosa problem is to decide whether the political and military costs as now foreseen are outweighed by the military strategic advantage gained in denying Formosa to Communist China. In studying this problem we should have in mind that we are considering possible courses of action to be undertaken not in the immediate future but perhaps during the course of next year. If during that period international Communism does not take advantage of the present military unpreparedness of the non-Communist world by launching overt military action over frontiers, that is, if Chinese Communism refrained from overt military aggression, it would seem indicated that primary reliance of international Communism might for some time still be on political and ideological weapons rather than overt military force in the struggle for Asia. Communist experience in Korea, where overt military force outran political preparation with what seems to date unsatisfactory results for Moscow, might well contribute to such a decision. If international communism does elect to fight the battle of Asia initially in the political and ideological sphere, we shall have to join the issue in that sphere and the political and psychological effects of our attitude toward Formosa will become extremely important.

If, contrariwise, international and Chinese Communism decide to embark upon new, major, overt military aggressive action in the near future in an effort to redress the balance now going against them in Korea, the changed situation would then assuredly warrant "a new look" at Formosa wherein military factors might, as on June 27, again dominate. We should then have a much larger degree of international sympathy for strong action respecting Formosa. It would hardly be to the advantage of the U.S., however, at this stage precipitately to take action to deny Formosa to Communist China at a cost of losing Asia to international communism.

It is believed that in the absence of a substantial shift in Asian opinion arising from Chinese Communist aggression or from an effective and convincing presentation by the Formosans of their case through a plebiscite, the U.S. should not oppose UN recognition of China's claim to Formosa. It should be emphasized again that one of the important advantages of procedures now contemplated for UN handling of the problem is that it would enable the U.S. to avoid for some time committing itself to the support

of any particular solution for Formosa, to see whether either of the foregoing contingencies develop. Should either contingency develop, the U.S. might support an alternative solution with substantially less political costs, although it would obviously have to give careful consideration to the desirability of assuming military responsibility for the protection of Formosa arising from support of such alternative.

The problem is substantially narrowed if it be tentatively assumed that China's claim to Formosa should be supported. However, there remain for consideration certain ancillary aspects of the problem. If the UN should award Formosa to China, it would, of course, in fact be awarding it to some Government of China. The question might arise - to which Government? It is believed that such a UN decision would place Formosa under the jurisdiction of the Government representing China in the UN at the time and that if, following the UN decision, the Government representing China in the UN should change, the new Chinese Government representing China in the UN would be deemed to have jurisdiction over Formosa.

The preceding discussion has been based primarily on a consideration of China's claim and of the wishes of the Formosan people. It is believed that a third factor arising from the recent history of Formosa should properly be taken into account by the UN. Formosa was used by Japan as a military base for aggression against southeast Asia. It was taken from Japan not as a result solely or even primarily of Chinese effort, but as a result of the efforts of the Allied Powers engaged in war against Japan. Those Powers have a legitimate interest in assuring that it shall not again be used as a base of aggression to threaten peace and security in the western Pacific area. Their will still remain to be expressed in a peace treaty with Japan. The United Nations may be assumed to have the same interest in the maintenance of international peace and order. It would therefore seem proper for the United Nations to consider means by which Chinese claims could be recognized without disregarding the broad security interests of other nations. Such consideration might result in a formula recognizing the validity of China's claim but deferring the effective exercise of Chinese sovereignty for a period; or it might result in the recognition of China's claim on condition that China formally agree to the demilitarization of Formosa for a determinate period. In the latter case it is believed that provision for periodical UN inspection to assure compliance would be highly desirable. Precedent for demilitarization of strategic areas by international agreement could doubtless be found. If Formosa were rendered innocuous from a military point of view, the official United States aim, in so far as given public expression to date, would have been achieved. To attempt more would be to raise doubts respecting our bona fides and possibly risk all.

分析：

在考慮解決臺灣問題的任何可能方案時，必須牢記臺灣局勢中的一些基本因素。這些因素包括：(1) 中國大陸的實力遠大於臺灣，任何試圖繼續將臺灣與中國大陸分離的臺灣政權最終都將失敗，除非得到外部力量的支持。目前，美軍的部署暫時彌補了軍事實力上的不平衡。(2) 任何以任何形式否認中國對臺灣主權的行為都將遭到中國人民的強烈反對。(3) 無論是中國共產黨政權或其他任何中國政權，都不會放棄中國對臺灣的主權聲索。如果這一聲索遭到否認，可以預見中國共產黨將動用一切手段，包括宣傳、顛覆、破壞、恐怖主義，甚至很可能訴諸公開的武力，以實現臺灣併入中國。(4) 國民黨政府在大多數中國人和某些與臺灣有著重大利益關係的外國政府眼中信譽掃地。

關於臺灣長期政治地位的替代方案可分為兩大類：(1) 承認中國的主權聲索，並將臺灣併入中國，無論是否附加條件；(2) 將臺灣從中國分離出去，使其成為獨立國家、聯合國託管地或日本的一部分。

鑒於在臺國民黨政府的軟弱無力，以及北平政權可能在不久的將來被聯合國承認為中國政府，方案(1)顯然存在導致臺灣併入共產主義中國的風險。因此，從美國軍事安全需求的角度來看，此方案最不理想。然而，如果聯合國決議要求採取此類解決方案，通常仍需強調此方案。

另一方面，如果採納方案(2)，則仍需採取一些措施來防止臺灣被中國吞併。如前所述，如果中國不肯放鬆吞併臺灣的努力，而臺灣本身又無力阻止，那麼就必須從外部提供保護，以抵禦中國的侵略。聯合國或許可以基於集體安全原則提供這種保護。然而，聯合國的集體安全理念相對較新，尚未完全確立。如果缺乏有效武力的支持，這項原則能否有效阻止企圖併吞臺灣的中國訴諸武力，這一點遠非定論。由於非共產主義國家普遍認為中國對臺灣擁有合法主權，因此臺灣在適用這項原則方面顯得相對薄弱。除非有壓倒性的證據證明共產主義中國是一個潛在的國際法違法者，應當受到約束，否則大多數聯合國成員國可能極不願承諾保衛臺灣。如果聯合國在承擔保護臺灣的責任方面發揮主導作用，那麼在許多重要方面，將會造成類似北韓入侵北韓之前的朝鮮半島局勢。聯合國和美國之所以抵制北韓的進攻，很可能也是出於同樣的理由，在這種情況下，它們會抵制中國在聯合國事先擔保下對臺灣的進攻。如果聯合國目前正在審議的提案獲得通過，允許各國軍隊的特定部隊在必要時用於組建聯合國軍事力量，那麼這支部隊很可能可以為任何形式的聯合國保護國提供實質支持。然而，美國很可能需要提供這支部隊的大部分兵力。如果這支聯合國部隊不足以抵禦中國的全面進攻（這種情況很有可能發生），那麼美國極不可能只投入事先與聯合國達成協議的、分配給聯合國的武裝力量，而不投入可能必要的額外兵力來防止其全軍覆沒。

因此，採納方案（2）實際上相當於預先將美國軍隊投入臺灣的防禦中，以抵禦中國的進攻。儘管這種承諾並非明示，但卻是真實存在的。因為如果中國攻擊臺灣，美國幾乎必然會投入兵力保衛該島，而不是承受對其自身和聯合國聲譽的巨大打擊。由此可見，聯合國承擔保護臺灣的責任，對美國造成的軍事負擔，

與美國單方面承擔這項責任基本相同。儘管如此，聯合國對保護臺灣的承諾，無疑會營造出更有利的政治氛圍。

美國在臺灣議題上的立場具有重大的政治意義。

美國在《開羅宣言》中聲明，其宗旨是臺灣和澎湖列島應歸還中華民國。美國在波茨坦會議上重申了這個宗旨，美國總統也在 1950 年 1 月 5 日關於臺灣問題的公開聲明中再次強調了這一點。在 1 月 5 日的聲明中，總統強調了美國在國際關係中的誠信，國務卿也在同一天強調了誠信在外交關係中的重要性，並表示無論法律形勢如何，美國都不會在「任何律師關於其立場誠信的言論」上斤斤計較。顯然，只有美國、英國和中國參與的《開羅宣言》對聯合國在臺灣問題上的任何決定都不具有約束力。然而，同樣顯而易見的是，《開羅宣言》的意圖不僅是眾所周知的，而且得到了世界輿論的廣泛認可。在聯合國討論臺灣問題時，美國在決定立場時，必須認真考慮《開羅宣言》。

人們普遍認為，《開羅宣言》促使美國致力於促成臺灣回歸中國，因此，美國支持任何將臺灣從中國分離出去的措施都將與該宣言相悖。有人認為，《開羅宣言》中使用的是「中華民國」而非「中國」，其目的是為了將臺灣歸還給中華民國政府。這種說法被認為是國務卿在 1 月 5 日所提及的「咬文嚼字」，既有失體面，也缺乏說服力。如果有人認為自 1943 年以來情況發生了實質性變化，蘇聯自那時起違反了多項承諾，有鑒於此，美國不再受其在開羅作出的承諾約束，那麼這種觀點就有可能被解讀為對蘇聯實踐中奉行的原則的堅持，即任何國家都可以在其認為情況發生變化時隨意撕毀其國際承諾。無論如何，僅僅因為蘇聯撕毀了在波茨坦所作出的承諾，就認為美國也有權撕毀其在開羅對中國而非對蘇聯作出的承諾，這種說法是極不公平的。問題的本質很明確。美國在開羅作出了某些承諾；作為一個主權國家，美國當然可以撕毀這些承諾；但這只會損害其自身的完整性和所秉持的原則。國務卿於 1950 年 1 月 5 日所持的立場至今仍然有效。

美國對臺灣問題的態度將深刻影響我們目前正在進行的亞洲政治鬥爭。至關重要的是，我們不僅要從自身的軍事戰略利益出發來考慮我們的態度，還要從亞洲各國人民將如何看待我們的態度出發。正如太平洋關係學會 (Institute of Pacific Relations) 勒克瑙會議上所清楚表明的那樣，亞洲對西方帝國主義的懷疑根深蒂固，如果還需要更多證據的話，尼赫魯 [Jawaharlal Nehru，印度總理] 的演講已經足以證明這一點。在當前情勢下，這種懷疑或許主要基於情感而非邏輯，但這仍然十分危險。美國在菲律賓和印尼問題上的行動，在一定程度上緩解了人們對其意圖的懷疑。

但潛在的懷疑依然存在，亞洲各地無疑普遍傾向將美國的舉動解讀為帝國主義的證據。臺灣對美國的戰略重要性近期在美國國內得到了公開強調，並至少獲得了半權威的認可。一些觀點認為，臺灣是美國控制東亞海岸線的一系列軍事基地的一部分。在這種情況下，如果美國在聯合國發起並支持旨在剝奪中國對臺灣控制權的措施（如果聯合國要採取此類措施，美國就必須發起並大力支持），那

麼這一行動很可能在亞洲被廣泛解讀為美國新的帝國主義行徑，並將極大地抵消我們在菲律賓和印尼問題上所取得的政治優勢。

此外，如果臺灣脫離中國，美國與臺灣之間必然存在的密切關係本身就會進一步證實亞洲各國對臺灣已成為美國傀儡的懷疑。在這種情況下，亞洲人或許不會覺得蘇聯在外蒙古的活動與美國在臺灣的活動有什麼區別，唯一的區別在於美國在聯合國擁有足夠的票數，為其帝國主義披上了一層外衣，使其獲得國際認可。從對亞洲政治格局的影響來看，這種態度在我們看來完全不合邏輯、毫無根據，這點相對而言並不重要。從政治和宣傳的角度來看，我們必須避免讓自己陷入這樣的境地：在亞洲人眼中，我們對蘇聯新帝國主義的警告被視為五十步笑百步。此外，我們必須考慮到，一些重要的西方國家也認為，如果我們想要避免在西太平洋形成一個滋生蔓延的勢力範圍，臺灣必須歸中國所有。

中國對臺灣的主權聲索基於以下事實：從大約 1684 年到 1895 年割讓給日本，滿清王朝對該島擁有主權；1943 年，英國、中國和美國在開羅正式宣布，臺灣島已被竊取，三國的目標是將其歸還中國；《開羅宣言》在《波茨坦宣言》中得到重申，日本接受了該公告作為投降的依據；自日本投降以來，中華民國政府一直管理著臺灣島民，並將其併入中原住民的國家，幾乎是中國人民的任何一個國家。

中國對臺灣島的主權聲索十分有力——遠勝於其他國家所能提出的主張。或許唯一能對中國聲索構成挑戰的，就是臺灣島人民的意願。因此，臺灣島人民的意願可能成為聯合國審議此議題時的重要因素。如果臺灣島人民能夠自由表達意見，那麼他們目前的意見很可能絕大多數都支持臺灣島自治，或者支持聯合國或美國對該島進行某種形式的託管。或許透過支持臺灣人民的意願，可以找到阻止臺灣落入共產主義中國的途徑。然而，儘管這種可能性乍看之下頗具吸引力，它也存在著許多困難和代價，需要仔細權衡。先前已有觀點指出，美國若採取此類行動，將構成政治糾葛，實際上會將臺灣的軍事防禦責任強加於美國。這項軍事承諾的規模直接取決於中國大陸的實力，因此無法估算，也無法預見何時能夠終止。同樣，我們也討論過違背開羅承諾所帶來的巨大政治代價。或許，我們違背該承諾最合理的理由是支持自決原則。然而，臺灣人民自決的理由本身存在諸多薄弱之處。

臺灣人爭取脫離中國獨立的運動起源於近代，更多是出於對當前利益的考量，而非深厚的民族情懷。人們認為，臺灣人對日本統治的不滿更源自於他們認為臺灣應該屬於中國，而非臺灣應該獨立。日本投降後，臺灣民眾似乎對回歸「祖國」的前景感到欣喜。國民黨的治理不善和戰敗、大陸的混亂以及對共產主義的反感，都造成了民眾對中國統治的普遍不滿，但這種不滿缺乏民族根基，也尚未展現出像波蘭人或芬蘭人擺脫沙皇統治那樣持久的力量。當然，從民族和歷史的角度來看，藏族或蒙古反抗被中國同化的鬥爭遠勝於臺灣人。或許正是因為這些原因，臺灣民眾要求脫離中國的訴求在亞洲至今鮮有支持，因為亞洲普遍認為臺灣屬於中國。

就在今年1月，美國也重申了對臺灣的義務。當國民黨省長陳毅屠殺約1萬名臺灣民眾，並繼續支持國民黨對臺灣的控制時，美國並未公開提出正式抗議，儘管這種控制顯然令臺灣原住民深惡痛絕。如今，中國共產黨確實有可能武力奪取臺灣。美國國內已多次公開且半權威地強調，中國共產黨對臺灣的控制將嚴重威脅美國在遠東地區的安全利益。綜上所述，至少在初期，美國很難在支持臺灣民眾反對中國主張的訴求方面發揮主導作用。

然而，美國可以大力支持臺灣民眾作為直接利益相關方向聯合國委員會表達意見的權利。如果臺灣民眾的陳述能夠獲得委員會，特別是亞洲成員國的強力支持，那麼美國或許可以在亞洲政治風險最小的情況下支持臺灣民眾的立場。但這樣做時，美國應當清楚地認識到：(1) 如前所述，這將使其承擔實際的軍事義務；(2) 透過聯合國監督的公民投票來確定臺灣民眾的真實意願，以及在幾乎可以肯定的中國國民黨反對的情況下落實這些意願，都存在著實際困難。

如果美國發起聯合國行動，賦予臺灣獨立於中國的地位，其政治代價將主要來自中國本土。迄今為止，美國在克服中國根深蒂固的排外情緒、贏得中國人民的信任和好感方面，比其他任何大國都更為成功。過去一個世紀以來，我們在中國累積的公眾信任和好感可能仍然相當可觀。這種潛在的好感，加上蘇聯在中國的野心與中國利益的根本衝突，構成了我們對抗蘇聯對中國控制的主要長期優勢。如果美國在臺灣問題上採取的立場被中國人民視為對開羅協議承諾的背棄，那麼其在中國的後果將嚴重打擊我們的長期地位。中國共產黨將以此為契機，動員各政治派別的中國民眾支持當前的反美運動，並能把自己塑造成中國領土完整的捍衛者，利用美國在臺灣問題上的立場來掩蓋蘇聯對中國北方領土的圖謀。（國務卿在1月12日已注意到這一因素。）中國現有的親美情緒很可能會遭受沉重打擊。這將引發美國與中國人民之間的問題，並成為美國與任何中國政府之間的主要摩擦點。最後，需要指出的是，任何將臺灣從中國分離出去的聯合國行動，都必然會賦予聯合國保護臺灣的責任，即便最樂觀的估計，也只能阻止共產黨將臺灣用作軍事基地。換言之，這種行動帶來的好處將完全是防禦性的。

在先前提及的美國訴求中，似乎只有那些與美國軍事安全利益相關的訴求，最有利於將臺灣從中國分離出去；而其餘訴求則強烈支持聯合國承認中國的領土主張。鑒於參謀長聯席會議先前對臺灣對美國戰略重要性的評估，認為不惜一切代價占領臺灣的政策是不合理的。因此，臺灣問題的核心在於，目前預見的政治和軍事代價是否大於阻止臺灣落入共產主義中國手中所獲得的軍事戰略優勢。在研究這個問題時，我們應該牢記，我們考慮的行動方案並非近期內即可實施，而是可能在明年實施。如果在此期間，國際共產主義不利用非共產主義世界當前軍事準備不足的局面，發動越境公開軍事行動——也就是說，如果中國共產黨不採取公開的軍事侵略行動——那麼似乎表明，在爭奪亞洲的鬥爭中，國際共產主義在一段時間內可能仍將主要依靠政治和意識形態武器，而非公開的軍事力量。在韓戰中，共產主義的經驗——公開的軍事力量超越了政治準備，迄今為止莫斯科似乎並未取得令人滿意的結果——很可能促成這樣的決定。如果國際共產主義選

擇先在政治和意識形態領域展開亞洲之戰，那麼我們也必須參與這一領域，而我們對臺灣的態度所產生的政治和心理影響將變得極為重要。

相反地，如果國際共產主義和中國共產主義決定在不久的將來發動新的、大規模的、公開的軍事侵略行動，試圖扭轉目前在朝鮮半島對其不利的局勢，那麼局勢的變化無疑將需要重新審視臺灣問題，屆時軍事因素可能像 6 月 27 日那樣再次占據主導地位。屆時國際社會對採取強硬措施維護臺灣權益的訴求應該會給予更大的支持。然而在現階段，美國貿然採取行動阻止共產中國獲得臺灣，最終導致亞洲落入國際共產主義之手，對美國來說絕非明智之舉。

人們認為，除非中國共產主義的侵略行為導致亞洲輿論發生實質性轉變，或者臺灣民眾透過全民公投有效且令人信服地陳述自身立場，否則美國不應反對聯合國承認中國對臺灣的主權聲索。需要再次強調的是，目前聯合國正在考慮的處理臺灣問題的程序的程序的一項重要優勢在於，它可以讓美國在一段時間內避免承諾支持任何特定的臺灣問題解決方案，從而觀察上述兩種突發情況是否會發生。如果任何一種突發情況發生，美國可能會支持一項政治成本低得多的替代方案，儘管它顯然必須認真考慮因支持該替代方案而承擔臺灣保護軍事責任的必要性。

如果暫且假設中國對臺灣的主權聲索應得到支持，那麼問題的範圍將大大縮小。然而，該問題仍有一些相關方面需要考慮。如果聯合國將臺灣判給中國，其實當然是判給中國的某個政府。問題可能在於——判給哪個政府？人們認為，如果聯合國作出此項決定，將使臺灣置於當時代表中國出席聯合國會議的政府管轄之下；若聯合國作出決定後，代表中國出席聯合國會議的政府發生變更，則新的代表中國出席聯合國會議的中國政府將被視為對臺灣擁有管轄權。

前述討論主要基於對中國利益和臺灣人民意願的考量。人們認為，聯合國也應適當考慮臺灣近期歷史中產生的第三個因素。臺灣曾被日本用作侵略東南亞的軍事基地。臺灣的收復並非完全或主要歸功於中國的努力，而是盟軍對日作戰的結果。這些盟軍有正當理由確保臺灣不再被用作侵略基地，威脅西太平洋地區的和平與安全。他們的意願仍需在與日本的和平條約中予以體現。聯合國維護國際和平與秩序的利益毋庸置疑。因此，聯合國考慮如何回應中國的訴求似乎是恰當的。

Recommendations:

- 1) The U.S. should refrain from stating its position with respect to the substantive question of Formosa's long-range status during the earlier investigative phase of UN consideration of the problem. It should take the attitude that it is wedded to no particular solution but expects to determine its position in the light of relevant factors brought out by UN investigation and study. Our attitude should be one of having no "special interests" in the island.
- 2) During this period the U.S. should follow closely trends of world, and particularly Asian, opinion regarding Formosa, especially when and as Chinese

Communist intentions become more evident and when the Formosans may have an opportunity to present their case.

- 3) If the trend of Asian thinking is in favor of separating Formosa from China, the U.S. should consider supporting the view, providing it is willing to undertake the concomitant military responsibility.
- 4) In the trend of Asian opinion continues strongly in favor of China's claim, the U.S. should not oppose that claim.
- 5) If China's claim is recognized by the United Nations, there should be a concurrent recognition of the Importance of Formosa to peace and security in the Western Pacific, with effort made to achieve demilitarization of the island, or other safeguards, by international agreement.

建議：

(1) 在聯合國對臺灣問題進行初步調查階段，美國應避免就臺灣長期地位這一實質問題表明立場。美國應採取不執著於任何特定解決方案的態度，而是期望根據聯合國調查研究得出的相關因素來確定自身立場。美國應秉持對臺灣不抱持任何「特殊利益」的態度。

(2) 在此期間，美國應密切關注世界，特別是亞洲關於臺灣的輿論走向，尤其是在中國共產黨意圖日益明朗，以及臺灣民眾有機會陳述自身立場之時。

(3) 如果亞洲輿論趨勢傾向將臺灣從中國分離出去，美國應考慮支持這一觀點，前提是它願意承擔相應的軍事責任。

(4) 如果亞洲輿論趨勢繼續強烈支持中國的主張，美國不應反對中國的主張。

(5) 如果中國的主張得到聯合國承認，則應同時承認臺灣對西太平洋和平與安全的重要性，並努力透過國際協議實現該島的非軍事化或其他保障措施。

5. 國務院中國事務辦公室關於臺灣問題的核對清單(1950年11月16日)

[全文照錄並中譯如下：]

Attached is a "Check List on Formosa Problem" which was used as a basis for preliminary discussion at the Pentagon this morning. At this preliminary discussion the status of the various resolutions on the UNSC and UNGA agenda was fairly well clarified. There was in addition considerable discussion of the application of the resolution to Formosa.

There seemed to be considerable doubt in the minds of the military men present regarding the practical significance of the resolution in question. I pointed out that our problem was one of political tactics, that the task was to get a measure of international

support for us in a position where heretofore we had stood alone, that the crux of the resolution was in the decision to establish a commission to study the question of Formosa, and that from the practical viewpoint the establishment of such a commission would tend to freeze Formosa in its present status and would, on the other hand, not commit the United States to any particular finding or resolution respecting the Formosa problem.

One of the outstanding items of interest to the others present was the effect that the resolution would have on (1) the disposition of the Seventh Fleet and (2) the implementation of any American program for the rendering of military aid to the National Government.

I informed Ken Young that you would speak chiefly on the factor of the political attitudes attendant upon the formulation and introduction into the UN of the reference resolution.

附件是一份「關於臺灣問題的核對清單」，今天早上五角大廈的初步討論以此為基礎。在這次初步討論中，安理會和聯大議程上的各項決議的現狀得到了較為清晰的闡明。此外，也就該決議在臺灣問題上的適用性進行了深入討論。

在場的軍方人士似乎對該決議的實際意義有相當大的疑慮。中國事務辦公室指出，我們的問題在於政治策略，其任務是爭取一定程度的國際支持，因為我們先前一直孤立無援。該決議的關鍵在於決定成立一個委員會來研究臺灣問題，而從實際角度來看，成立這樣一個委員會可能會使臺灣維持現狀，另一方面也不會使美國就臺灣問題做出任何具體的調查結果或決議。

在場其他人士最感興趣的一個問題是，該決議將對以下兩方面產生影響：(1) 第七艦隊的部署；(2) 美國向國民黨政府提供任何軍事援助計畫的實施。隨後討論核心為聯合國提出和審議該決議過程中可能引發的政治爭議。

Check List on Formosa Problem

1. What is the status of the various resolutions, complaints and agenda items in the UN?
 - a. U.S. proposal in General Assembly.
 - b. Chinese Communist complaint against U.S. aggression in Formosa.
 - c. Soviet complaint against U.S. aggression in China.
 - d. China's complaint against U.S. aggression in China.
 - e. Etc.
2. What is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the neutralization of Formosa and the possibility that Formosa may have to be used as a base for operations against the mainland of China?
3. What is the possibility that the Chinese Communists may use Formosa as a

bargaining point in the settlement of the Korean problem?

附件：關於臺灣問題的核對清單

1. 聯合國各項決議、指控和議程項目的進度如何？
 - a. 美國在聯合國大會上的提案。
 - b. 中國共產黨對美國侵略臺灣的指控。
 - c. 蘇聯對美國侵略中國的指控。
 - d. 中國對美國侵略中國的指控。
 - e. 等等。
2. 臺灣的「中立化」與臺灣可能被用來作為對中國大陸作戰基地的可能性有何關係？
3. 中國共產黨利用臺灣作為解決北韓問題的談判籌碼的可能性有多大？

五、「從一省到一國：從 1951、1971、1991 三個關鍵年代；From a Province to a Sovereign State: Political Changes in Taiwan from the Three Critical Years 1951, 1971 and 1991」座談會

3 月 30 日晚間，考察團前往華府臺灣基督長老教會（Taiwanese Presbyterian Church of Washington），由陳儀深館長以「從一省到一國：從 1951、1971、1991 三個關鍵年代；From a Province to a Sovereign State: Political Changes in Taiwan from the Three Critical Years 1951, 1971 and 1991」為題，向華府臺僑鄉親發表演說。

（一）演講紀實

陳儀深館長的演講梳理了臺灣從「一省」轉型為主權國家的政治歷程。內容聚焦於 1951 年、1971 年與 1991 年三個關鍵轉折點，詳述了臺灣地位未定論的國際法起源，以及中華民國在失去聯合國席位後轉向內部民主化的演變。透過史料與外交電文，揭示了當年政府內部對國家名稱與憲政改革的決策。這段歷史見證了政權如何透過住民自決與制度更迭，逐步落實「中華民國臺灣」的現狀。演講不僅回顧了外部主權的爭取，也紀錄了臺灣邁向民主自由實體的轉變路徑。將臺灣從殖民地演進到「主權國家」的政治歷程，整理為以下三個關鍵年代的重點敘述。

1951 年臺灣地位未定論的確立，從「收復失地」到「地位未定」：二戰後美國原依《開羅宣言》協助中華民國占領臺灣，但在 1949 年國共內戰局勢明朗及

1950 年韓戰爆發之後，美國為防止臺灣落入中共手中，開始主張「臺灣地位未定」。國際和約的法理基礎：1951 年的《舊金山對日和約》及 1952 年的《臺北和約》中，日本僅表示「放棄」對臺灣及澎湖的一切權利，並未明言歸還給哪一個國家。防衛範圍的確立：1958 年的八二三砲戰後，美國透過《臺灣決議案》將防禦範圍擴及金門、馬祖，使臺澎金馬在實質管轄上成了一體。

1971 年外部正當性危機與「革新保臺」：1971 年聯合國通過第 2758 號決議，排除「蔣介石代表」，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為唯一代表中國的合法政府。中華民國失去「代表全中國」的外部正當性。此時需要的內部改革，失去聯合國席次後，國民黨政府轉向內部改革以爭取支持，蔣經國浮上檯面推動「革新保臺」，包括增額中央民意代表改選、提拔臺籍青年菁英(如李登輝)以及推動十大建設。體制變革的構想：當時的外交部次長楊西崑曾向蔣介石建議將國號改為「中華臺灣共和國」(The Chinese Republic of Taiwan)，並主張舉行全島公民投票以決定臺灣未來地位，但此類激進變革在當時並未實現。

1991 年憲政改革與中華民國「臺灣化」，包括終止動員戡亂：李登輝總統於 1991 年廢除《動員戡亂時期臨時條款》，啟動一連串憲政改革，包括國會全面改選與後來的總統直選。後來面臨制憲與修憲之爭：當時民進黨主張「制憲」，而國民黨主導「修憲」；最終透過六次修憲，使國家與政府的正當性改為僅來自臺灣人民的授權。兩岸關係定位：李登輝於 1999 年提出兩岸是「特殊的國與國關係」。後來的蔡英文總統則進一步提出「中華民國臺灣」，強調中華民國已在臺灣屹立超過七十年，這是現今社會最大的共識。

當前現狀與國際支持，臺灣的民意共識：根據 2007 年的民調，高達 76% 的民眾認為臺灣是主權獨立的國家，並不同意臺灣是中華人民共和國的一部分。而美國方面透過「六項保證」強調協助臺灣自我防衛，其並未改變關於臺灣主權不屬於中國的立場

總結來說，臺灣的政治演進是從早期法律上的「地位未定」，經歷失去國際代表權後的內部改革，最終透過 1990 年代的民主化與憲政改革，完成「中華民國臺灣化」的歷程。



陳儀深館長發表演說

六、華府參訪國家檔案館博物館、雙橡園及臺灣人公共事務會

（FAPA）華府總部

4月1日上午，考察團成員與駐美大使俞大瀟夫婦、駐美代表處文化組哈莎玲秘書一同前往位於華盛頓特區的國家檔案博物館（National Archives Museum）參訪，聽取館員進行導覽解說，並參觀檔案庫房。中午前往雙橡園拜訪，並出席由駐美大使俞大瀟夫婦招待、駐美公使楊懿珊陪同之午宴。下午前往 FAPA 於華盛頓的總部拜訪。原定赴國會山莊參觀，為爭取時間查閱檔案而取消。

（一）機構介紹

國家檔案博物館位於華盛頓特區，為 NARA 的博物館、檔案庫房及辦公大樓。公開展示美國建國時期三件重要文獻，《獨立宣言》、《美國憲法》與《權利法案》的原件，並同時說明這三份文獻的起草歷程，及其對美國與世界的持續影響。其他展間則展出建國之後與國家發展息息相關的歷史文件。

雙橡園（Twin Oaks Estate）建於 1888 年，原為美國國家地理學會創辦人赫巴德（Gardiner Greene Hubbard）的夏日別墅，1937 年中華民國政府向赫氏家族承租作為駐美大使館官舍，並於 1947 年購入。之後雖歷經兩國關係之波折，但

雙橡園 80 多年來經歷 25 位大使與代表，仍作為駐美代表處招待來訪貴賓的重要場所。

（二）參訪紀實

三份重要文獻展出於自由憲章圓形大廳（Rotunda for the Charters of Freedom），由館員解說文獻的內容及保存狀況。並介紹其他展廳。包括，《美國的故事》（The American Story），涵蓋美國歷史發展中的國土擴張，1803 年從法國購入土地的路易西安納購地案，還有各式總統收到的禮物，如英國女王伊莉莎白二世（Elizabeth II）贈予老布希（George H. W. Bush）總統的馬蹄鐵，與義大利總理贈予川普總統的紅領帶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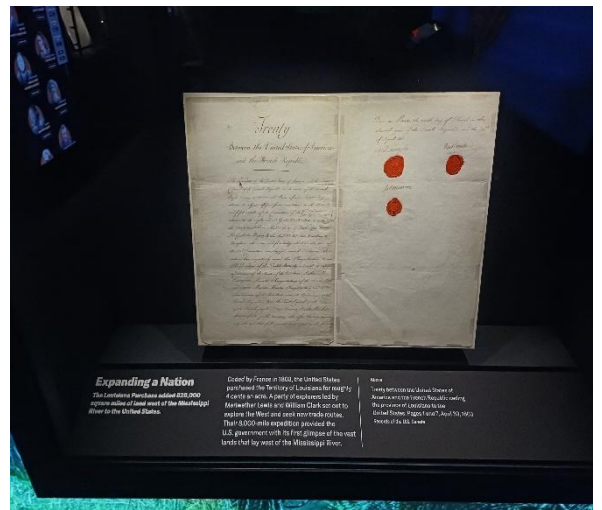
博物館主要展場



館員解說文獻



美國《獨立宣言》



1830 年路易西安納購地案



總統的國禮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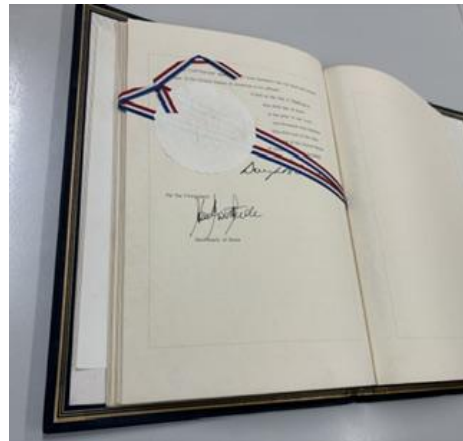
接續由館員帶領參觀檔案庫房，得見《中美共同防禦條約》（Sino-American Mutual Defense Treaty）、《臺灣關係法》（Taiwan Relations Act）等與戰後臺灣命運與地位息息相關的條約協定原件。



《中美共同防禦條約》



《臺灣關係法》



參訪國家檔案館結束後，前往雙橡園，由駐美大使俞大濤、駐美公使楊懿珊親自接待館長並簡介雙橡園的歷史與情況。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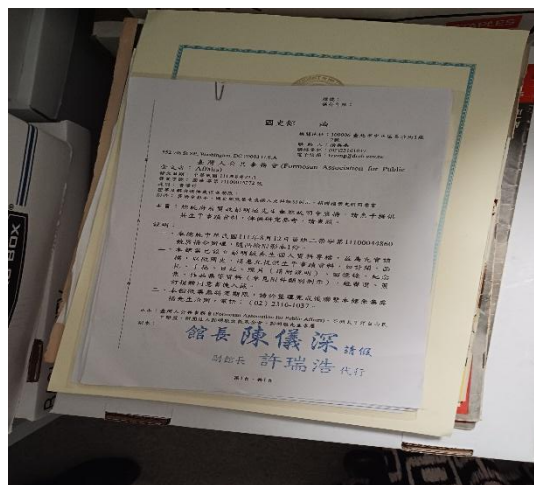
歷任駐美大使的照片

俞大使夫婦、楊公使與陳儀深館長

下午前往 FAPA 在華府的總部，拜訪蕭喬勻執行長、高龍榮前總會長、林素梅總會長，瞭解近年該會於國會推動之友臺法案、以及近來臺美關係發展的狀況。



與 FAPA 人員互動



國史館與 FAPA 往來函件

七、普林斯頓大學特藏部暨穆德圖書館 (Princeton University Library :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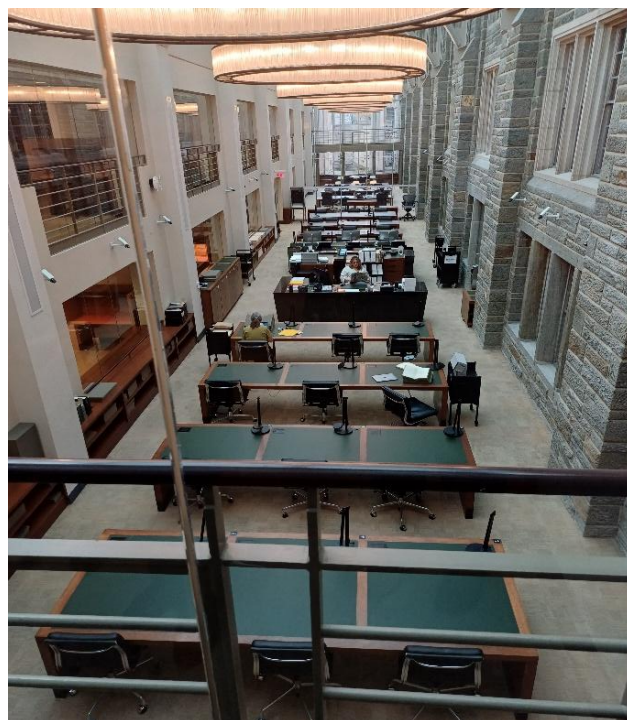
Special Collections、Seeley G. Mudd Manuscript Library) 與葛

斯德東亞圖書館 (Princeton University Library : East Asian Library)

4月3日，上午考察團由前往普林斯頓大學圖書館參訪。由普林斯頓大學圖書館特藏部暨穆德圖書館主管 Daniel J. Link、普林斯頓大學葛思德東亞圖書館館長何義壯 (Martin Heijdra)、東亞圖書館中文部主任邵玉書 (Joshua Seufert) 親自接待。下午前往東亞圖書館，參觀東亞圖書館的館藏。參訪結束後，雙方進行座談。



普林斯頓大學穆德圖書館



普林斯頓大學圖書館特藏部閱覽區

（一）機關介紹

普林斯頓大學穆德圖書館成立於 1976 年，為普林斯頓大學特藏圖書館，該館有兩大特色：一、藏有大量有關 20 世紀以來美國公共政策的檔案文件；二、同時為普林斯頓大學的檔案館，館藏檔案文件排架有近 42,000 英尺長。有關二十世紀美國公共政策的檔案文件，分為四大項目，包括法學、新聞學、公共政策與資訊、國際發展，收藏包含個人與組織捐獻的檔案資料，如艾森豪總統（Dwight David Eisenhower）時期的美國國務卿杜勒斯（John Foster Dulles）文書。該館不但是研究冷戰時期年代美國政治、外交史重要的寶庫，更因杜勒斯曾出任美國國務卿，對冷戰初期美國對臺政策以及臺海情勢扮演關鍵角色。杜勒斯的檔案文件，對研究冷戰初期美國對臺政策、美臺關係以及東亞局勢甚為重要。

葛思德東方圖書館是美國最重要的東亞圖書館之一，從 1920 年代開始蒐集了許多中國古籍，胡適曾於在 1950 至 1952 年間擔任圖書館館長。圖書館現有館藏 500,000 餘冊。其中中文書約 370,000 冊。日文藏書約 100,000 餘冊，韓文約 9,000 冊。藏書內容以研究東亞中、日、韓各國的人文科學及社會科學書刊為主，除了傳統中國醫學與佛教的古籍之外，還包括古典文學、小說、歷史地理等領域，並藏有從宋代到清代近 3000 餘冊善本書。另有視聽資料、電子書與資料庫等，可供研究和學習使用。

（二）參觀紀要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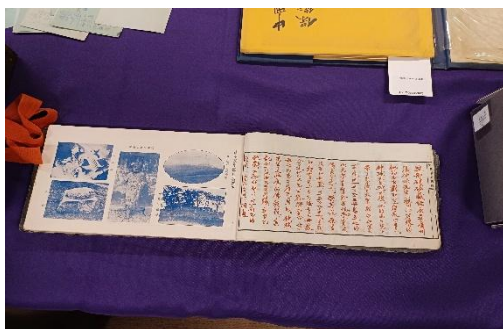
於普林斯頓大學圖書館特藏部主管 Daniel J. Link 介紹普林斯頓大學圖書館特藏部的運作方式與館藏。首先介紹特藏部的閱覽區域、讀者休息區、特藏資料暫存區等。並簡介數位化作業區域，並說明依照檔案文件數位化排程，由主管成立委員會決定數位化的進程及優先順序，考慮預算、檔案使用率、以及是否有人提出特別申請等因素。



何義壯館長則講述東亞圖書館的歷史演進與珍貴藏品。內容提到胡適在 1950 年代初期曾受聘於普林斯頓大學，當時他在資源匱乏的情況下，利用私人時間對館藏進行深入研究。何館長詳細介紹了著名的葛思德文庫，說明其如何從最初的私人收藏轉變為由大學管理的過程。文中特別強調了館內保存的宋、元、明三朝刻本、永樂大典副本以及敦煌文獻等珍貴館藏。此外，館長也說明了普林斯頓大學東亞系與圖書館之間相輔相成的發展關係。



何館長說明，胡適在館期間儘管當時資源匱乏，仍利用這段時間對葛斯德文庫藏書中的珍本進行了深入研究。他曾詳細研究過館藏中極為珍貴的宋版《磧砂藏經》，並留下手稿。胡適曾對多本藏書進行研究與整理。但，



令人惋惜的是，在後來的書籍裝裱修復過程中，工作人員不慎將胡適留在書中的一些字跡或紙條移除，導致部分研究原件佚失。



胡適在普林斯頓的時光更像是一位身處特殊時期的客座學者，而非傳統意義上的行政館長。他在艱苦的條件下，依然憑藉其深厚的學養，對館藏的珍本與重要稿本進行了具開創性整理與研究。

（三）參訪與座談紀實

館方人員說明圖書館與東亞系及多個研究中心的緊密合作，特別提及商人葛思德（Guion M. Gest）與其顧問義理壽（Irvin Van Gorder Gillis），在早期如何建立起文庫中豐富的中文典籍、中醫文獻及稀有文物的收藏。館方也說明了在取得中國當代政治資料、少數民族文獻以及數位化發展上的努力，並提到與哈佛大學等常春藤盟校東亞圖書館，採取共享書庫的合作模式。座談中亦涉及學術名人余英時、胡適與圖書館的互動關係，以及館員在協助學者開拓研究方向時扮演的專業角色。

館方簡介圖書館概況與服務對象。說明普林斯頓大學圖書館共有十個分館，東亞圖書館是其中之一。特別的是，普林斯頓大學是先有東亞圖書館（1920 年代），後來才成立東亞系。主要服務對象為東亞系、當代中國研究中心、全球日本實驗室（Global Japan Lab），以及社會學系、政治學系中從事東亞研究的師生。該館秉持知識公開的原則，以現有資源對外開放，並盡量延長開放時間。除在校學生可借書，一般研究者亦可入館閱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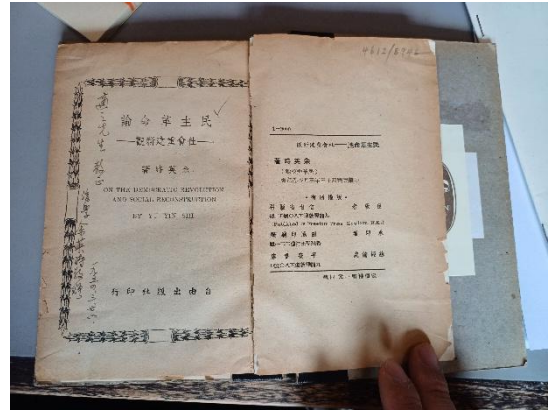
館藏特色與珍貴資料，尤其歷年來大量購入中共內部資料，一般人難以取得，甚至有中國學者特地前來查閱。還有非正式出版物，收藏許多中國內部無 ISBN 的內部交流書籍、地方性小期刊及中央電視臺的內部通訊資料。還有擁有豐富的中醫歷史資料，曾吸引許多國際學者進行科學史研究。圖書館還收藏 1950 年代根據底片延伸繪製的敦煌壁畫復原作品（非拓片），這在當時是作為展覽用的重要文物。圖書館內最高等級的藝術文物目前已移交至普林斯頓藝術博物館保存。

座談有提及胡適擔任該館館長時的情況，館內至今仍保存著他當初使用過的椅子。亦討論到余英時教授，余教授與該館關係密切，其夫人也經常到館使用。余教授在普林斯頓任教期間，每學期通常開設一至兩門研究生課程。其手稿與珍貴資料後來由館方協助，捐贈給臺灣的中央研究院。

在提到圖書館經營管理方面，由於空間限制，僅 30% 的書籍放在館內，其餘 70% 存放於校外書庫（ReCAP）。館方並積極數位化特藏資料（如內部刊物目錄），並公開於網路上供全球研究者使用。



何館長、邵主任和陳館長座談與互動



余英時親筆簽名送給胡適的書籍



胡適的親筆註記

(四) 普林斯頓大學圖書館藏杜勒斯文書 (John Foster Dulles Papers) 有關臺灣法律地位、戰後臺美關係等檔案史料調查蒐集

(一) 蒐集資料標的

杜勒斯 (John Foster Dulles, 1888-1959)，美國華盛頓特區人。出生於基督教家庭，外祖父、姨父官拜國務卿，普林斯頓大學、喬治華盛頓大學法學院畢。早年為執業律師，專精國際法，曾參與美國和平談判委員會、賠款委員會，出席海牙會議、巴黎和會、舊金山世界組織會議、聯合國大會等，參與起草《聯合國憲章》，締造《舊金山和約》。公職生涯漫長卓越，致力於戰後國際和平建構、美國在全球治理中的定位，以及冷戰時期美蘇關係等重大議題，對美國外交政策的形成產生深遠影響。艾森豪 (Dwight Eisenhower) 兩任總統任期連續出任國務卿，任內主張對蘇聯侵略採取大規模報復戰略，落實反共防禦聯盟，包括強化北大西

洋公約組織、創建東南亞公約組織，與南韓、中華民國簽訂共同防禦條約等。1959年4月因病辭職，不久逝世。

杜勒斯文書時間範圍主要涵蓋 1945 年至 1960 年，1958 年杜勒斯捐贈母校普林斯頓大學，1961 年其中部分文件移轉至美國國家文書暨檔案總署。杜勒斯文書存放於普林斯頓大學杜勒斯外交史圖書館（John Foster Dulles Library of Diplomatic History），與總圖書館費爾斯通紀念圖書館（Harvey S. Firestone Memorial Library）的珍稀書籍和手稿庫房相連，讀者可於管理手稿原件的穆德圖書館（Seeley G. Mudd Manuscript Library）進行調閱。杜勒斯文書完整記錄其一生公共服務與對美國外交政策的貢獻，本次蒐集標的包括函件系列（Selected Correspondence, 1891-1960）、講詞、聲明及記者會等系列（Speeches, Statements, Press Conferences, Etc, 25 April 1913 – 23 April 1959）、杜勒斯夫人檔案系列（Janet Avery Dulles Files, 1911-1962）等三個系列與臺灣法律地位、戰後臺美關係等相關文件。以下簡介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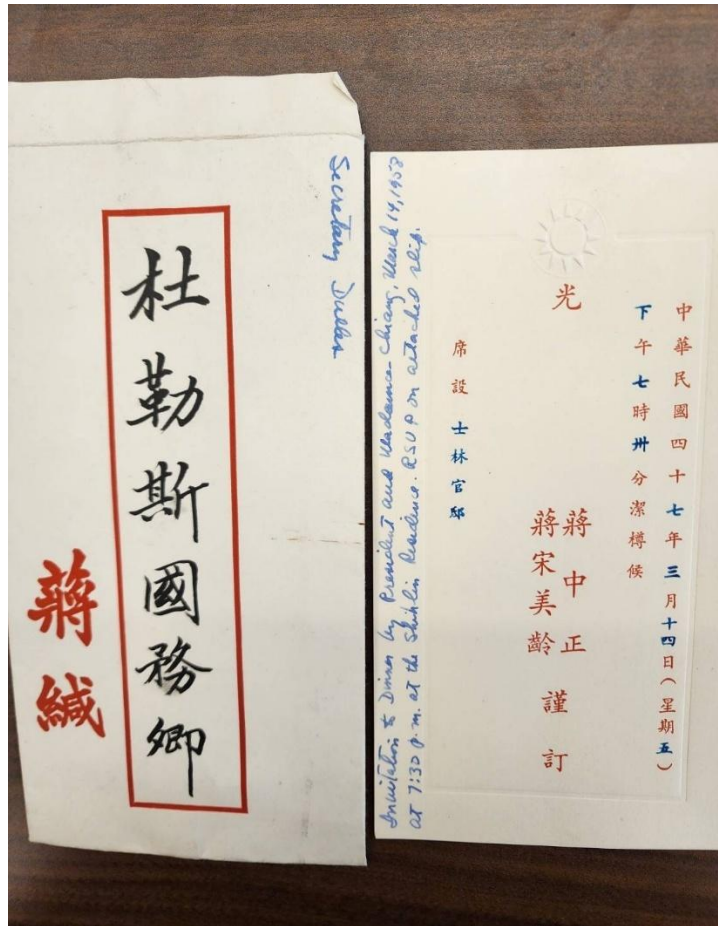
1. 函件系列：收錄杜勒斯的公務信函以及若干與私人信件。杜勒斯曾與世界各地的政治家、政府官員和各國領導人以及美國國內關心此事的民眾就一系列與其為美國政府服務相關的問題進行通信。內容涵蓋締約、結盟、立法、聯合國、美蘇關係、促進和平、原子武器等各項美國外交政策，以及與各國政府、民間人士的往來函件。本次蒐集標的包括該系列對日和約、中華民國、臺灣、金門馬祖等文件共計 23 盒。

2. 講詞、聲明及記者會等系列：收錄杜勒斯發表的演講稿及已發表的聲明，包括向商業和政治組織、國會委員會、政治會議、聯合國等發表演講，以及國務卿任內歷次出訪等講稿。本次蒐集標的包括該系列 1950-1951 年等文件共計 5 盒。

3. 杜勒斯夫人檔案系列：收錄有關杜勒斯夫人參與杜勒斯政治生涯的資料，特別是陪同杜勒斯執行公務的旅行紀錄，包括其著作、行程、函件、剪報、節目單、照片、活動紀念品等。本次蒐集標的包括該系列函件、日記及札記、文件等共計 10 盒。



陳館長翻拍檔案。



杜勒斯夫人檔案系列收入 1958 年 3 月蔣中正、宋美齡夫婦致杜勒斯晚宴邀請函

(二) 未刊史料舉隅

1. 前參議員杜勒斯致參議員范登堡 (Arthur H. Vandenberg) 有關臺灣情勢與法律地位函 (1950 年 1 月 6 日)

[全文照錄並中譯如下：]

Dear Arthur:

Events have moved so rapidly with the President's and Acheson's statement about Formosa that it seems to me that there is not left any chance for constructive action, and it is a case where we must cry over spilled milk!

I had prepared quite a memorandum on the possibilities of taking Formosa to the United Nations Assembly on the theory that Formosa was a non-self-governing territory, and that the best solution might be an interim period at least of trusteeship under Article 77, providing for trusteeship of "territories which may be detached from enemy states as a

result of the Second World War”, and on the theory the Charter obligation to treat the welfare of the inhabitants as paramount cut across any Cairo Declaration

Obviously the present situation was not foreseen at Cairo or Potsdam, and it seems to me little short of scandalous for us to adopt the theory that Formosa is already a part of China and that, therefore, the Formosans must be subjected to the cruel fate of being the final battleground between the Red regime and the Nationalist Army.

It seems to me that the tragedy of Formosa is the Formosans. There is a normal population of about six million, probably now swelled to around seven million. In other words, the population is about the same as Australia and greater than that of at least twenty nations members of the United Nations.

They have a distinctive economic, social and cultural life and for about two generations (55 years) have had no political ties with China. From the standpoint of economic development, literacy, etc., they are much in advance of most of China.

Acheson's statement of yesterday attempted to strike a very high moral note about respecting the integrity of other countries. I would think that we ought to have had some respect for the six or seven million people in Formosa who, ever since Cairo, have been dealt with from the standpoint of the strategy and prestige of great powers without regard to their own welfare or desires.

In the case of Korea, the Japanese mandated islands and the Italian colonies, we brought the situations before the United Nations to deal with in accordance with the Charter principle of the welfare of the peoples involved. And the final decisions were decisions of the United Nations. It is quite true that we turned over Formosa to the Nationalists and turned over the Kuriles to Russia without waiting for a treaty, but I don't think that it is merely a “lawyer's quibble” to say that unless there is either treaty action or United Nations action, the change is not finalized. Certainly I would think it right to keep that chance alive when it is the only chance of saving six or seven million innocent people from a very cruel fate.

However, as I say, I think this is all academic now because of the finality of the President's and Acheson's statements and the fact that probably at this late date the United Nations would resent having the problem dumped in its lap.

Faithfully yours,

尊敬的范登堡：

總統和艾奇遜就臺灣問題發表聲明後，事態發展如此迅速，在我看來，已經沒有任何採取建設性行動的機會了，我們只能為打翻的牛奶哭泣了！

我曾就將臺灣問題提交聯合國大會的可能性準備了一份備忘錄，其理論依據是臺灣是一個非自治領土，最佳解決方案或許是根據《聯合國憲章》第 77 條設立一個過渡性的託管期，該條款規定了對「因第二次世界大戰而從敵國分離出來

的領土」的託管。此外，我還認為，《聯合國憲章》中關於將居民福祉置於首位的義務凌駕於任何《開羅宣言》之上。

顯然，開羅會議和波茨坦會議都沒有預料到目前的局勢，而我們卻接受臺灣已經是中國的一部分，因此臺灣人註定要遭受成為紅色政權和國民黨軍隊最終戰場的殘酷命運的理論，在我看來，這簡直是駭人聽聞。

在我看來，臺灣的悲劇就在於臺灣民眾。臺灣常住人口約 600 萬，如今可能已膨脹至 700 萬左右。換句話說，臺灣人口與澳洲大致相當，甚至超過至少 20 個聯合國成員國的人口總和。他們擁有獨特的經濟、社會和文化生活，並且在過去兩個世代（55 年）的時間裡，與中國沒有任何政治聯繫。

從經濟發展、識字率等方面來看，臺灣遠超過中國大部分地區艾奇遜昨天的聲明試圖營造一種尊重他國領土完整的道德氛圍。我認為，我們理當尊重臺灣 600、700 萬人民，自開羅會議以來，臺灣人一直被列強從戰略和聲威的角度對待，而臺灣人的福祉和意願卻被置之不理。

至於朝鮮、日本託管島嶼和義大利殖民地，我方已將這些情況提交給聯合國，由聯合國依據《聯合國憲章》中關於相關人民福祉的原則進行處理。最終也由聯合國做出決定。誠然，我們未經條約就將臺灣移交給國民黨人，將千島群島移交給俄國，但我認為，除非有條約或聯合國行動，否則此一改變尚未最終完成，這並非僅僅是「法律上的吹毛求疵」。當然，如果這是拯救 600、700 萬無辜民眾免於殘酷命運的唯一希望，我認為保留此種可能性是正確的。

然而，正如我所說，鑒於總統和艾奇遜的聲明已成定局，而聯合國可能在此時此刻也不願接手這個燙手山芋，我認為這一切已成為純理論問題。

杜勒斯

2. 國務院顧問杜勒斯有關臺灣情勢備忘錄（1950 年 4 月 21 日）

[全文照錄並中譯如下：]

China, by virtue of her size, population, and historical prestige, exercises an important influence on all the other countries of Asia.

At this very moment the National Government of China has a larger and more experienced military force than all other Asian countries combined.

At this moment the island of Formosa has a larger concentration of trained administrators and engineers than any other area in Asia of similar size and population. Last year with the aid of ECA the National Government carried out a fundamental agrarian reform on Formosa. Previous to the reform the peasants had to pay to the landlords a rent averaging more than 50 percent of the crop. After the reform the rent is

limited to 37.5 percent. Today, the peasants are contented. The National Government has no difficulty in recruiting soldiers in Formosa.

Both industrial and agricultural production on the island of Formosa has been restored to the pre-war level. The supply of electricity is both ample and cheap. The railways are now in good working order, although the equipment is old.

The National Government can and does perform two important missions in the world's struggle against communism. In the first place, the National Government can establish on Formosa a concrete example of a better way to economic improvement and national and individual freedom than through communism. In Asia and the Far East such a practical demonstration is much needed and cannot fail to have wide-spread effects.

In the second place, the National Government can foster and promote an effective resistance movement on the mainland, thus exercising an important deterrent influence on the southward expansion of communism. The people on the mainland have been disillusioned about communism. They are suffering from famine which is due partly to natural causes and partly to the export of food to the Soviet Union and to administrative stupidity on the part of the Communists. People of all classes, including the workers, have been bitterly disappointed by the Communist rule. Advantage should be taken of this psychological situation. The National Government is in the best position to take such advantage.

The National Government of China needs a moderate measure of aid from the United States. At this moment the greatest source of worry is the possible development of inflation on Formosa. Hitherto, prices and exchange rates have been relatively stable, far more stable than on the mainland. However, the monetary reserves are dangerously low. The National Government has requested, through the representative of ECA in Formosa, the assignment of \$30,000,000.00 from the surplus fund of ECA as a stabilization fund with joint Chinese and American supervision. No expenditure from this fund can be made without the agreement of the American representative.

The \$30,000,000.00 stabilization fund, which we now request, is in addition to the current ECA expenditure on Formosa.

The National Government in procuring military supplies from the United States. We hope that the maximum facilities will be given, both in regard to prices and in regard to the issue of license.

China's representation in the United Nations has been challenged by the Soviet Union. The question is one of more prestige. Whether the National Government or the Peiping regime will be represented in the United Nations will be interpreted by the people in China as a measure of the world's estimate of and regard for the two rival political regimes in China. We hope that the Government of the United States will give to the National Government stronger support in this matter than heretofore.

The National Government of China, through its permanent Representative with the United Nations, has called the attention of the world to the military aid which the Soviet Union is giving to the Chinese Communists in the form of military air craft and personnel. China, on February 7 of this year, submitted to the Interim Committee a draft resolution which, among other things, called for the sending of a naval and air observation group to China. It is most probable that the Chinese Communists would not permit such a group to make observations in Shanghai, Nanking and Hsueh where Soviet aircraft is concentrated. Nevertheless, such a UN observation group would have some value in the case of a Communist offensive against Formosa. In that case, the observation group could certainly obtain ample evidence of the degree and type of Soviet help to the Chinese Communists. Furthermore, such a group through indirect sources might also obtain considerable information. It is to be noted that Malik, the Soviet Delegate has characterized China's information as being unsubstantiated and slanderous. It means that the Soviet Union denies the fact but does not try to justify it. An UN observation group would exercise some moral restraint on the Soviet Union in giving help to the Communists in China and, in future, in other parts of Asia. With such minimum aid the National Government on Formosa can continue to perform the two important missions as set forth above. It seems to me that this moderate investment on the part of the United States will yield better results than any similar investment in any other region of Asia.

中國憑藉其幅員遼闊、人口眾多和歷史地位，對亞洲其他國家都具有重要影響力。

目前，中華民國政府擁有的軍隊規模和經驗都超過了亞洲其他國家軍隊的總和。

目前，臺灣島擁有的訓練有素的行政人員和工程師比亞洲其他任何面積和人口相近的地區都更加集中。

去年，在美國經濟合作總署的援助下，中華民國政府在臺灣島實施了一項根本性的土地改革。改革前，農民必須向地主繳納平均超過收成 50% 的地租。改革後，地租被限制在 37.5%。如今，農民們生活安寧。中華民國政府在臺灣島招募士兵也毫無困難。

臺灣島的工農業生產均已恢復到戰前水準。電力供應充足且價格低廉。鐵路雖然設備老舊，但目前運作良好。

國民政府能夠在世界反共鬥爭中履行兩項重要使命。首先，國民政府可以在臺灣樹立一個具體榜樣，證明有一種比共產主義更好的經濟發展和民族及個人自由的途徑。在亞洲和遠東地區，這種實踐示範至關重要，必將產生廣泛影響。

其次，國民政府可以在大陸扶持並推動有效的抵抗運動，對共產主義南下擴張有重要的嚇阻作用。大陸人民已經對共產主義感到失望。他們正遭受飢荒，這

部分是自然原因造成的，部分是由於糧食出口到蘇聯以及共產黨的行政愚昧造成的。包括工人階級在內的各階層人民都對共產黨的統治感到極度失望。應該利用此種心理形勢。國民政府最有能力利用這種情況。

3. 國務院顧問杜勒斯致國務卿艾奇遜（Dean Acheson）有關目前情勢評估函（1950年11月30日）

[全文照錄並中譯如下：]

To the Secretary from Mr. Dulles

Between my morning and afternoon meetings with Senators Taft and Millikin, I Jotted down the enclosed notes which I read to and Tart in the afternoon, indicative of my on initial reactions to the Korean developments.

John Foster Dulles

致國務卿

在上下午分別與參議員塔夫特（Robert A. Taft）和米利金（Eugene D. Millikin）會面的空檔，我記下了隨附的筆記，並在下午念給塔夫特聽，這些筆記表明了我對朝鮮半島局勢發展的初步反應。

杜勒斯

Estimate of the Situation

1. Developments in Asia confirm that there is a comprehensive program, in which the Soviet and Chinese communist are cooperating, designed as a present phase to eliminate all Western influence on the Asiatic mainland, and probably also in relation to the islands of Japan, Formosa, the Philippines, and Indonesia. It would be reckless not to assume that such a program has been carefully worked out and that steps are being prepared to implement all its various aspects. What has happened shows that our policies have been sound in so far as they have recognized the impossibility of separating the Chinese and Soviet communist, at least for the predictable future. The mistake has been inadequate appraisal of the danger that resulted from the hostile alliance. Through underestimating the risks, we may have been sucked into a major military disaster in Korea which could not only gravely impair, for a time, the military capability of the United States everywhere, but which would have

grave psychological repercussions upon the Japanese nation and the countries and islands of South East Asia.

1. The repercussions will not be limited to Asia, but will extend to Western Europe and the British Commonwealth. These countries have misjudged the situation in China even more seriously than have we. Nevertheless, they have until now deferred to our policies, particularly in relation to Korea. If these policies lead to a major disaster, they may be less disposed to follow us in the future, despite the fact that in reality our policies were more nearly right than were theirs.
2. As far as the future position in Asia is concerned, it would seem that we must now more closely limit ourselves to areas subject to sea and air power, which fits our natural role.
3. The question of whether we can hold on in Korea and if so, where, is of course a military one. From a political stand-point, however, it is Important to hold at least a sizeable beachhead in south Korea so as to deny this area to communist military concentrations which, with the concentration already present in Sakhalin Island, would put Japan in position where the nation would probably reconcile itself to falling into the Soviet communist orbit. It would not now seem practical to proceed with a formal Japanese peace treaty, but if Japan is not to fall under communist control, a major political effort is required. This would doubtless involve some sort of agreement with Japan which, while short of a formal peace treaty, would restore to Japan a large measure of self-government together with the capacity and, we might hope, the will to use her strength in the cause of the free world, or at least to make the exertions necessary to prevent communist conquest of this area, which with its industrial power and trained and disciplined manpower is a dominant factor in Asia and the Pacific.
4. As regards Vietnam, it would seem that this situation would need to be reconsidered in the light of what might be a hopeless military situation, given the efforts which the Chinese communist seem prepared to make.
5. It would seem that there should be a review of our attitude towards Formosa. Our sea and air power and the presence of the Chinese Nationalists, should make it possible to salvage Formosa, and perhaps and perhaps use it as a base for covert and perhaps open Chinese activities against the China mainland, which would at least divert the Chinese communist government.
6. Consideration should be given to the possibility of stimulating guerrilla and insurrectional activities in China against the Communist government. We presently have good will and friends, but this will not be indefinitely available in the face of propaganda and purge.

7. It would seem important to accelerate some understanding with Australia and New Zealand, the only two dependable countries in the Pacific area.
8. So far as Europe is concerned, it must, I think, be taken as doubtful that there will be time to create an effective European army at the rate this is now moving, or perhaps even at the optimum rate. If so, the question of the best use of our economic, military and manpower resources would need to be reconsidered.
9. In general, it would seem that consideration should be given to the possibility of stepping up subversive activities within areas of Soviet control, wherever there are any elements available for such purposes. We can not safely go on playing a purely defensive role, as this enables the potential enemy to organize themselves at one place or another with a pre-arranged time table which we have no will or capacity to disarrange. Our best defense lies in exploiting potential jealousies, rivalries, and disaffections within the present area of Soviet communist control so as to divert them from external adventures to the problem of attempting to consolidate an already over-extended position.

情勢評估

1. 亞洲局勢的發展證實，蘇聯和中國共產黨正合作實施一項全面計畫，旨在消除西方對亞洲大陸的一切影響，也可能包括對日本、臺灣、菲律賓和印尼等島嶼的影響。如果認為這項計畫已經過精心策劃，並且正採取措施實施其各個方面，那就太草率了。已經發生的事情表明，我們的政策是正確的，因為我們認識到，至少在可預見的未來，將中國和蘇聯共產黨分開是不可能的。錯誤在於我們對敵對聯盟帶來的危險評估不足。由於低估了風險，我們可能在韓戰中陷入一場重大的軍事災難，這不僅會在一段時間內嚴重削弱美國在世界各地的軍事能力，而且還會對日本以及東南亞各國和島嶼造成嚴重的心理影響。

其影響不僅限於亞洲，還將波及西歐和大英國協。這些國家對中國局勢的誤判甚至比我們更嚴重。儘管如此，這些國家迄今仍對我方政策表示支持，尤其是在北韓問題上。如果這些政策最終導致重大災難，他們未來或許就不太願意追隨我方了，儘管事實上我方政策比其政策更為正確。

2. 就未來在亞洲的地位而言，我們現在似乎必須更嚴格地將自身活動範圍限制在海空力量覆蓋的區域，這更符合我方自身的角色定位。

3. 我們能否在朝鮮半島堅守陣地，以及如果能，又該守住何處，這當然是一個軍事問題。然而，從政治角度來看，在韓國南部至少要占據一個相當大的灘頭陣地，以阻止共產主義軍隊在此集結兵力。如果共產主義軍隊已經集結在庫頁島，那麼日本很可能就會被迫接受落入蘇聯共產主義陣營的命運。現在與日本簽署正式的和平條約似乎並不現實，但如果日本不想落入共產主義的控制之下，就必須做出重大的政治努力。這無疑需要與日本達成某種協議，雖然這種協議並非正式的和平條約，但將恢復日本相當程度的自治權，並賦予其能力，我們或許可以希

望，也賦予其意願，使其能夠運用自身的力量為自由世界事業服務，或者至少能夠做出必要的努力，阻止共產主義軍隊占領此一地區。該地區擁有強大的工業實力和訓練有素、紀律嚴明的勞動力，是亞洲和太平洋地區的主導力量。

4. 至於越南，鑒於中國共產黨似乎準備做出的努力，考慮到越南可能面臨的絕望的軍事形勢，這種情況似乎需要重新考慮。

5. 看來我們應該重新檢視對臺灣的態度。憑藉我們的海空部隊和國民黨的存在，我們應該能夠挽救臺灣，甚至將其作為基地，進行針對中國大陸的秘密或公開活動，至少可以轉移中國共產黨政府的注意力。

6. 我們應該考慮在中國境內進行反抗共產黨政府的游擊戰和起義活動。我們目前擁有善意和朋友，但面對宣傳和清洗，這些優勢不會永遠存在。

7. 加速與澳大利亞和紐西蘭（太平洋地區僅有的兩個可靠國家）的相互了解似乎至關重要。

8. 就歐洲而言，我認為，以目前的速度，甚至以最佳速度，能否有足夠的時間建立一支有效的歐洲軍隊，都值得懷疑。果真如此，我方需重新考慮如何最有效地利用經濟、軍事和人力資源。

9. 總體而言，似乎應考慮在蘇聯控制區內加強顛覆活動的可能性，只要有任何可用於此類目的的人員。我們不能繼續扮演純粹的防禦角色，因為這會讓潛在的敵人有機會在某個地方按照預先安排好的時間表進行集結，而我方既沒有意願也沒有能力去打亂他們的計劃。我方最好的防禦策略是利用蘇聯共產黨控制區內潛在的嫉妒、敵意和不滿情緒，使他們無法將注意力從對外冒險轉移至鞏固已經過度擴張的陣地上。

八、「紀念二二八—談蔣介石的責任問題及其他」座談會

4月3日晚間，考察團前往羅格斯大學（Rutgers University）Bucsh 學生中心，由 FAPA 紐澤西州分會負責人 何明宗先生主持，陳儀深館長以〈紀念二二八—談蔣介石的責任問題及其他〉為題，向紐澤西州的臺僑鄉親發表演說，並於演說後與聽眾互動。

（一）演講紀實

陳儀深館長在演講中講述蔣介石的決策核心與派兵責任，指出蔣介石作為當時的最高領導人，其責任可從軍事派遣與行政處置兩方面觀察。根據包括根據檔案顯示，蔣介石曾親筆批示派兵。檔案揭露他在 3 月 5 日即電令從上海派遣憲兵與步兵團來臺。其次，當時中國國民黨的中全會已通過決議，要求將臺灣省行政長官陳儀「撤職查辦」。然而，蔣介石卻以「總裁」身分獨斷推翻此決議，將陳儀調任為行政院顧問，後更升任浙江省主席，刻意規避對失職官員的責任追究。

針對歷史上常被用來為蔣介石辯護的「嚴禁報復」電報，陳儀深館長提出了質疑。蔣介石雖曾發電要求「嚴禁報復」。但事後參與鎮壓與報復行為的將領不降反升，甚至獲得記功獎勵。在整個事件後，並無任何軍政人員因違反「嚴禁報復」指令而受到實質法律制裁。而且在事件發生前，監察委員楊亮功已多次呈報在臺官員貪污腐敗、民怨四起的實況，但蔣介石並未及時採取改革措施。

二二八事件發生雖然緝菸血案是開端，但 2 月 28 日中午行政長官公署衛兵向群眾開槍掃射才是事件全面爆發的真正導火線。此現場有聯合國救濟總署（UNRRA）人員目擊，證實軍方在無預警下造成大量死傷。

陳儀深館長並繼續說明事件在現代轉型正義與法律訴訟的情況，受難者家屬雖然曾嘗試對國民黨提起民事訴訟，要求公開決策檔案、道歉並賠償。但該訴訟最終被法院以「黨政分立」及「時效消滅」為由駁回。這反映了當時臺灣司法體系在應對威權時期「黨政一體」的歷史實況時，缺乏轉型正義的思維。

陳儀深館長講述二二八事件的記憶與紀念正由年輕一代接手，如「共生音樂節」的舉辦，透過音樂與多元社團參與，將沉重的歷史轉化為現代民主價值的討論。

陳儀深館長並討論了《舊金山和約》架構下的地位與前途，認為臺灣應在歷史論述中釐清自我定位，強化抵抗外來侵略（特別是針對中共）的內部共識。並建議參考美國日裔或非裔博物館的模式，更有系統地將臺灣受難者的歷史與臺灣人對世界的貢獻展現給國際社會。



陳儀深館長發表演說



陳儀深館長回應聽眾提問

九、國家憲法中心與獨立廳

（一）機構介紹

國家憲法中心是以美國憲法歷史為主題的博物館，2003 年落成。該館主要展示美國憲法的形成過程，以及伴隨國家發展，關於憲法的修訂的歷程，包含，對國家的主權與政府職能的確立、人民權利與義務的規範等等。透過常設互動式展覽、珍稀的歷史文件、各式研究成果及視聽資料，提供公民教育，向社會大眾展示美國憲法的形塑歷程。

美國獨立廳完整落成於 1753 年，原為賓夕法尼亞州殖民地的議會和法院，之後為第二次大陸會議場地及美國《獨立宣言》簽署地，亦為美國憲法的制訂地。在美國定都華盛頓特區之前，位於費城的獨立廳曾作為國會開會場地。

（二）參訪紀要

4 月 4 日上午，考察團前往國家憲法中心參觀，「建國展廳」的一場深度導覽，詳盡回溯了美國革命至憲法制定的關鍵歷史。影音導覽內容首先探討了引發戰爭的殖民地抗爭與《獨立宣言》的深刻影響，特別強調了女性、非裔與原住民在動盪時期的角色與立場。

接續，由館員導覽帶領參訪走進歷史展覽，解析在美國在立國之初的庶民生活，以及在制憲過程中，聯邦主義者與反對派針對政府權力、代表權以及奴隸制折衷方案的激烈辯論。最後，導覽藉由在「憲法簽署廳」的真人比例銅像與多媒體互動，具體勾勒出開國元勳們在費城形塑國家基石的歷程。



下午，參訪獨立廳。導覽轉向議事廳，導覽人員敘述第二次大陸會議在此投票通過《獨立宣言》的過程，以及後來制定美國《憲法》的關鍵時刻。這座建築

見證了從反抗英國統治到建立新政府法律框架的演變，並提及如華盛頓（George Washington）、傑佛遜（Thomas Jefferson）與富蘭克林（Benjamin Franklin）等核心人物。最後，導覽員將歷史連結至現代，說明獨立廳如何成為後世美國人民持續爭取民權與平等的象徵性地標。



獨立廳的外觀



《獨立宣言》簽署地



賓夕法尼亞殖民地法院

肆、參訪心得

一、檔案史料管理部分及資料蒐集

（一）資料查詢與專業人員提供協助：NARA 所轄檔案館及各總統圖書館，皆提供公開查詢服務，並建置數位檔案目錄。研究者可透過線上或現場申請閱覽公文、照片、微卷與影音材料。其中尤以國家檔案館二館最為重要與繁忙，每年服務數萬人次的學術與資訊查閱需求，館方依照查詢資料的類型、領域、時限，分別備以專業館員協助查詢，得以協助查詢者更為快速地、準確地搜尋到所需資料。

（二）政府資訊公開與資料可透過申請解密：為了資訊公開與保障人民知的權利，人民可藉由《資訊自由法》（Freedom of Information Act，簡稱 FOIA），向政府機構要求調閱官方檔案與紀錄，並進行複製。而 NARA 轄下更設有國家解密中心（NDC），負責和其他政府部門協調加速檔案的審查與開放。

（三）多元保存技術、數位轉型持續推動史料數位化：採用多樣的技術與機器，用以保存檔案資料、微卷、電子郵件、錄音、影片與實體物件，並在數位化後，存於數位資料庫對外開放。並同時進行檔案文件 OCR（Optical Character Recognition，光學字元辨識）作業，將檔案文件中的手寫文字、印刷文字轉換成數位文字，運用於數位資料庫中，將更有益於查詢者的搜尋與使用。

（三）此次於國家檔案館、普林斯頓大學穆德圖書館閱覽檔案，蒐集到剛解密與戰後初期臺美關係、臺灣地位有關的檔案資料，以及穆德圖書館所藏杜勒斯文書中的檔案資料，將收錄於本館今年出版的史料集。有益於社會各界瞭解戰後初期臺美關係與臺灣法律地位發展之脈絡。

二、總統檔案館及大學圖書館部分

（一）此次參訪釐清 NARA 與各總統圖書館的關聯性，以及各總統圖書館作為公（聯邦政府）私（私人基金會）合作的樣式與典範。

（二）總統圖書館的轉型模式：隨著數位化平臺與技術進步，檔案資料不一定以紙張文件等實體方式留存，已逐漸轉型為數位資料。歷來總統任內檔案文件由 NARA 與總統圖書館收藏，但 2026 年 6 月開幕的歐巴馬總統中心（Barack Obama Presidential Center）僅典藏及展示數位資料。

（三）大學圖書館提供功能與空間整合規劃，普林斯頓大學圖書館特藏部除了結合檔案典藏與閱覽，設置明亮且舒適的研究閱覽室。而東亞圖書館則與大學系所合作爭取資源，盡量延長開放時間，以提供讀者最便利的閱覽服務。

（四）大學圖書館進行跨校合作，避免資源重置與浪費：普林斯頓大學東亞圖書館與其他同盟學校的東亞圖書館合作，將資源集中用以購置珍貴圖書，並由各校分別收藏，提供跨校借閱的服務，使各東亞圖書館能有更多資源用以營運與購置書籍。

伍、建議事項

一、刊布檔案史料，強化中華民國臺灣主體意識

檢視臺灣國際法律地位的歷史演變，必須同時放在國際局勢與臺灣內外治理環境的脈動之中，並結合國際法規範隨時間的發展與變遷，方能獲得清晰而完整的理解。過往研究在引用美國等主要國家對臺灣地位的法律見解時，往往忽略影響相關政府決策的國內外政治背景，致使對法律問題的分析與詮釋難以完全貼合歷史脈絡。再者，臺美關係攸關中華民國在臺灣的生存與長期發展，回顧歷史、掌握脈絡尤為重要，相關史料的整理與出版具有不可或缺的價值。自冷戰以來，美臺關係的演進必須置於美國與蘇聯、日本、中國及其他相關國家之互動中，進行全面性的考察，方能呈現其真實面貌與深層意涵。此行調查蒐集戰後臺灣法律地位檔案史料，將收錄於本年出版之《從開羅宣言到舊金山和約—戰後臺灣法律地位史料集》等。建議本館持續進行相關檔案史料之蒐集、刊布、研究等工作，強化中華民國臺灣主體意識。

二、推動與國外檔案典藏機關、總統圖書館、學術研究機關共同研究與出版

本館近年積極拓展與國外檔案典藏機關、總統圖書館等交流合作，與美國史丹佛大學胡佛研究所檔案館、韓國國史編纂委員會、國立大韓民國臨時政府紀念館等先後簽署學術交流協定書，此行與普林斯頓大學特藏圖書館、東亞圖書館等洽商進行檔案史料資源運用，建立學術交流與合作。近年與胡佛檔案館已合作出版《戰後臺灣史料與研究—黃杰任職警總時期日記》，並規劃出版《戰後臺灣史料與研究—王昇與軍援越南工作史料集》，以及與韓方合作出版《東亞人物與戰後臺灣史料選編—蔣中正、金九與李承晚》等。建議本館以東亞人物與戰後臺灣專題，推動與國外檔案典藏機關、總統圖書館、學術研究機關共同研究與出版，進行深度學術交流，持續深化國際夥伴關係。

三、調查蒐集總統副總統文物，充實總統資料庫及轉型後之歷任總統圖書館館藏

本館典藏大量總統副總統文物，且是《總統副總統文物管理條例》之主管機關，可謂目前國內典藏、研究與編纂總統、副總統相關資料最為完整的政府機關。無論是在本館架構下設立歷任總統圖書館，或由本館直接轉型為歷任總統圖書館，本館皆已具備相當充分的基礎與條件。近年出版蔣中正、陳誠、蔣經國日記，李登輝僚屬故舊訪談錄、大事長編及陳水扁訪談錄，本年即將出版嚴家淦大事長編等。自 2022 年歷任總統資料庫上線以來，陸續開放並擴充蔣經國、李登輝總統資料庫，蔣中正總統資料庫並將於本年底開放，免費提供各界使用，造訪資料庫人次累積已超過 200 萬人次。依照館藏、各檔案典藏機關目錄及所蒐集到的海內

外各式資料，豐富且多元地充實資料庫的內容。建議本館持續將調查蒐集與館際合作獲得的檔案資料，數位化並建置於資料庫內，提供社會大眾與學界一個良好的資料使用平臺，俾利歷史教育與研究的推廣。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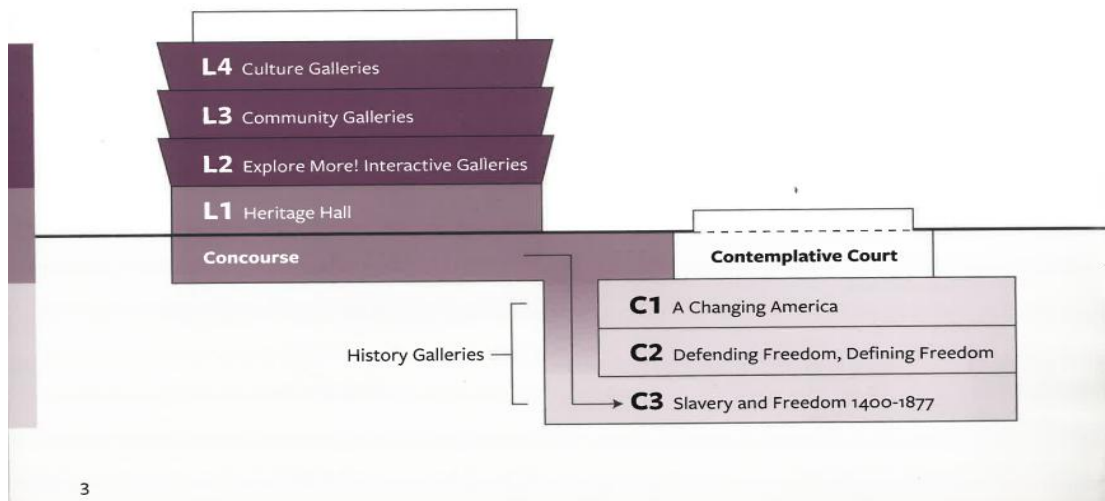
陸、參考資料

一、國立非裔美國人歷史與文化博物館相關資料

摺頁



Museum Levels



二、美國大屠殺紀念館相關資料

摺頁

“I lived through a ghetto, four camps, and a death march. ... I knew this is a country that I'll have all the opportunities I missed out on.”

—Nesse Godin, Holocaust Survivor and Museum Volunteer
Born in Siauliai, Lithuania, in 1928

Cover Photos: Newly liberated prisoners at the Altach concentration camp wave a homemade American flag to greet US Seventh Army troops. National Archives & Records Administration flag given to US Army Sergeant Donald Hall after the liberation of the Langenstein concentration camp. His family donated it to the Museum's collection, which belongs to the American people. US Holocaust Memorial Museum Collection, gift of the family of Donald J. Hall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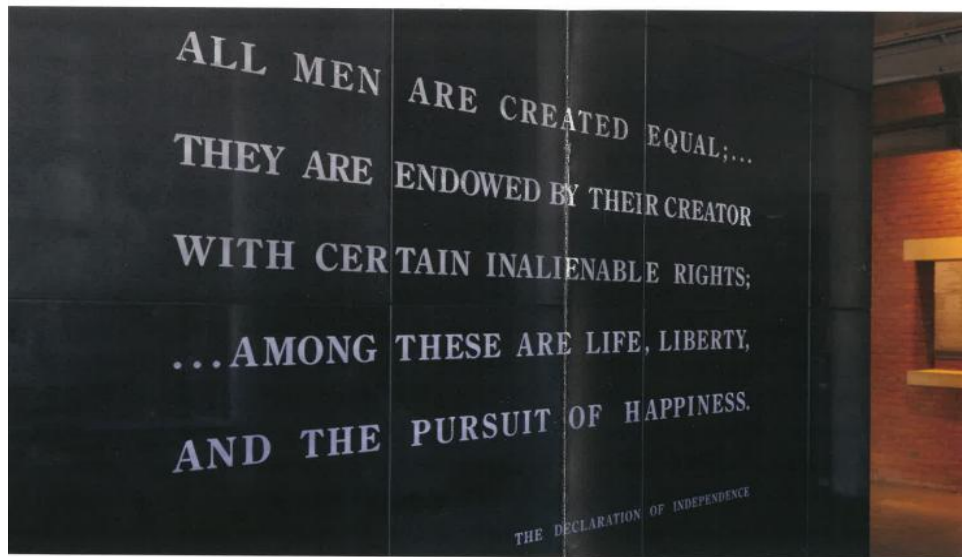
UNITED STATES
HOLOCAUST
MEMORIAL
MUSEUM

Commemorating
America 250

Lessons from the Holocaust about freedom,
democracy, and our founding principles

LEARN MORE
ushmm.org/america250

UNITED STATES
HOLOCAUST
MEMORIAL
MUSEUM



Standing between our nation's monuments to George Washington and Thomas Jefferson, the Museum reminds us to treasure American democracy and its founding principles.

Above, this quote from the Declaration of Independence, written by Thomas Jefferson, greets visitors at the Museum's 19th Street entrance, US Holocaust Memorial Museum

To me, America is a land of opportunity, a land where we hope that the freedoms of today will exist for generations to come."

—Rachel "Rae" Goldfarb, Holocaust Survivor and Museum Volunteer
Born in Dekazyc, Poland (present day: Dekoyec, Belarus), in 1932



Skeptical of the reports of Nazi atrocities, General Dwight D. Eisenhower made a point to visit a liberated camp to see for himself, and wrote of his shock and horror, and his fear that people might not believe the truth. The US Army proceeded to document extensive evidence of the Holocaust, and in the decades after the war American soldiers, who were among the first eyewitnesses to the Holocaust, would share what they witnessed with the American people.

National Archives

THE MUSEUM AT A GLANCE

PERMANENT EXHIBITION 4th–2nd Floors

The self-guided tour takes most visitors one to three hours. Enter via the elevators near the Information Desk.

HOLOCAUST MEMORIAL 2nd Floor

The Hall of Remembrance is our nation's memorial to the victims of the Holocaust.

THE WEXNER CENTER 2nd Floor

Learn about recent genocides, and conduct research about Holocaust victims and survivors.

RESOURCES FOR CHILDREN 1st Floor and Lower Level

Remember the Children: Daniel's Story and the Children's Tile Wall are appropriate for children eight years and older.

MUSEUM SHOP and CAFE 1st Floor and Eisenhower Plaza

The shop is near the 14th Street entrance. The cafe is across the plaza on the 15th Street side.

TEMPORARY EXHIBITIONS [Lower Level](#)

Changing exhibitions explore specific themes in Holocaust history that challenge us to reflect on our responsibilities.

Hours: 10 a.m.-5:30 p.m. daily
Closed: Yom Kippur, Christmas

Please Note: Visitors to the Museum may make and share personal photos or audiovisual recordings unless otherwise posted. Flash photography is not permitted in the Museum, nor is eating, drinking, or smoking.

Restrooms are located on the Lower Level.

For more information, visit ushmm.org or call 202.488.0400.



UNITED STATES
HOLOCAUST
MEMORIAL
MUSEUM

150 Rand Waikberg Place, SW Washington, DC 20024-2126 ashew@u.washington.edu

MUSEUM GUIDE

**THIS MUSEUM IS NOT
AN ANSWER.
IT IS A
QUESTION.**

UNITED STATES
HOLOCAUST
MEMORIAL
MUSEUM ushmm.org

**THE MUSEUM'S WORK
TO INSPIRE
ACTION**

A nonpartisan, federal educational institution, the United States Holocaust Memorial Museum is America's national memorial to the victims of the Holocaust dedicated to ensuring the permanence of Holocaust memory, understanding, and relevance. Through the power of Holocaust history, the Museum challenges leaders and individuals worldwide to think critically about their role in society and to confront antisemitism and other forms of hate, prevent genocide, and promote human dignity. It focuses on:

Teaching the dangers of unchecked hate to young people around the world. Every year, thousands of educators receive training at the Museum and across the country to teach the Holocaust effectively in their classrooms.

Addressing the threat of genocide today by raising awareness about areas at risk of group-targeted violence and inspiring action to prevent it.

Advancing democratic values and ethical leadership. The Museum offers professional development to judges, police officers, members of the military, senior US government officials, and other groups that safeguard democracy.

Confronting the rising tide of antisemitism and Holocaust denial through our multilingual website and efforts to collect evidence and ensure the Holocaust is studied and remembered.

Credits: All photos: US Holocaust Memorial Museum unless otherwise indicated. **Cover:** Shows concentration camp prisoners in Majdanek. US Holocaust Memorial Museum. **g/y of the Nazis:** *Concentration Camps*, Poland. **Page 2:** *Large Page for the US Holocaust Memorial Museum*. **Page 4:** *Two Jews are led away from the burning Warsaw Ghetto by SS guards.* National Archives; *bottom left to right:* German children pose over an anti-Semitic, schoolbook. *Southwold, Norfolk:* A woman sits on a bench marked "Only for Jews." *Cambridge:* see page 10.



The fact that an abundance of people are present gives me hope that future generations will achieve a world of tolerance and understanding.

—Enn. New Jersey



三、國家檔案館相關資料

參考書籍講述館藏與展覽。解鎖的歷史檔案庫：在國家檔案館中發現美國歷史

